



2011 年 2 月 28 日 3 期

总第六十八期

2008 年 9 月 13 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

## 本期目录

### 【史林一叶】

[杜钧福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运动的另一面](#)

[王 锐 文革中亲属同遭专政机关杀害的案例](#)

### 【风云人物】

[余汝信 康生的另一面](#)

### 【争鸣】

[陆小宝 怎样理解“剥洋葱”——与沈昆同学商榷](#)

### 【简讯】

[梁志福 《邱会作回忆录》、《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分别在香港出版](#)

### 【文摘】

[程 光 回味“九一三”](#)

[徐 罗 军宣队指导员张国臣](#)

### 【小资料】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名单](#)

### 【编读往来】

[1、周七月谈王任重与红卫兵](#)

[2、李逊谈“砸联司”武斗与死亡人数](#)

[3、庄菁瑞谈读 67 期感想](#)

[4、马小星谈读张鲁文章感想](#)

[5、编者启事：本刊从半月刊改为月刊](#)

---

##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另一面

杜钧福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是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把文革推向高潮的一个关键阶段。但在一般文革史著述中对这一运动都只有简单的否定而无具体的深入分析。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一书中，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了这样的说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个政治上十分有害，理论上错误荒谬，事实上缺乏任何依据的荒唐罪名，必须彻底否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第一版，258 页）金春明在《“文化大革命”史稿》中指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一个生拉硬凑的怪罪名。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通常用法，路线分歧是指党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比较系统的分歧意见，一般是属于党内矛盾。它可能是资产阶级影响在党内的反映，也可能并不是不同阶级意识的表现，而只是无产阶级内部的不同认识。……将党内的路线分歧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是极不恰当的。特别是再加上反动二字，就更显得不伦不类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9 月第一版，186—187 页）在几篇专门论述的文章中，王年一的《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主要是从官方角度否定该运动。卜伟华在博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也有论述，体现了遵从主流意见和尊重事实之间的折中。印红标的文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对路线：造反运动的兴起》（《二十一世纪》，1995 年 10 月号）则很准确地给这次运动定了位置。

### 一、批判矛头超出了“五十天”

有论者认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是多此一举。典型如王年一所言：“派工作组即使算作错误也早已纠正”。刘冰认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

个概念出现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是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坚持党的领导、派遣工作组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主张。在那次全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同志都已作了检讨，工作组也早已撤回，为什么还要批判呢？”（刘冰《风雨岁月：1964-1976 年的清华》，2008）

这一说法的根据是陈伯达 1966 年 10 月 25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何而来呢？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主要表现在怀仁堂几次会议上的汇报和决定的一些问题。”他指的是 6 月份在怀仁堂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运动的汇报和派工作组的决定。

实际上，随着运动的发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容已经扩展到了“五十天”之后，并非仅指派工作组问题，而是包含了两部分：一为“五十天”的问题；另一为发生在“五十天”后的政治迫害现象。所以《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中说：“（‘十六条’公布后）‘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对‘五十天’之后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尤其重要，如众所周知的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事件，如‘红八月’的屠杀事件。清华大学的三个劳改队就是在工作组撤出后成立的，刘冰不应忘记。

卜伟华的文章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在中央的支持下，一大批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人得到了平反，许多被‘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以及‘老红卫兵’打击、压制的群众也得到了平反。”这也涉及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撤出工作组后是否已解决的问题。

北京五十二中被迫害致死的郑兆南老师是一项典型事例。她的包含血泪控诉的自述在 1966 年 9-10 月间传遍北京，为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作了舆论准备。她在自述里控诉的是工作组，但是根据她的叙述，她被拘禁、殴打了 47 天，在被释放 4 天后死去。而她的死亡是在 8 月 26 日以后。所以，对她施暴的主要是红卫兵，而不是工作组。濒临死亡的郑兆南仍按中央的精神将控诉对象锁定为工作组，而不是红卫兵，因为中央仍高度肯定红卫兵在“红八月”中的作用“好得很”。

从毛泽东发动这个运动的初衷来说，可能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也为了发动

群众，其内涵是被严格限制了。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说：“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大量工作组去镇压革命的学生，这就是犯了路线错误。没有派多少工作组的地方，或者没有派工作组的地方，如果那里镇压革命的学生，同样是犯了路线错误。”这里说的，是指压制、打击“革命积极分子”、镇压“革命学生”，不包括其他人。但是在群众批判的过程中，参与的群众对其有了更广义的理解并在具体行动中体现，虽然有的仍然是用批判“五十天”的名义，如郑兆南所做的那样。以下所说的一些事情，可能也超过毛的预计。

## 二、群众批判中的一些具体内容

我们看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运动有些什么具体内容（这是一些研究者没有注意或有意回避的），由此即可了解它是如何把群众发动起来的，怎样把经历过“反右派”运动之后的“万马齐喑”局面变成了人人敢言“造反有理”、举目皆是“造反”红袖章的景观。

### 1，销毁“黑材料”

所谓“黑材料”是指“五十天”内工作组或各级党组织所整的批判对象的材料。作为批判对象，当然包括造反的“革命积极分子”和“革命学生”，但也肯定包括其他各色人员，特别是按文革前标准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员。但是这两种人员很难区分。我们单位当时企图公布被整人员名单，就产生这样的困惑。但是无论如何，所有被整人员，至少其中大多数，被当时社会舆论看作是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群众。

### 2，解散“牛鬼蛇神劳改队”

少数单位的劳改队成立于1966年6月份，多数成立于8月初。此时，毛泽东严厉指责了刘少奇在“五十天”内实行“白色恐怖”，解放了遭到迫害的学生如蒯大富。但是，更多的不属于“革命积极分子”和“革命学生”的人进了劳改队，遭受比“革命学生”在“五十天”内更严重的折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开始后，没一位中央首长要求解散劳改队。但是群众，特别是造反派，也有部分领导，根据对这次运动的理解，自动解散了

劳改队。如我们单位，是在 10 月份一位造反派贴出《造牛鬼蛇神劳改队的反》的大字报后，劳改队才解散的。

当然也有少数单位没解散劳改队。如北京六中，由“西纠”旗下的红卫兵成立的黑监狱一直为非作歹，草菅人命，直到 11 月 19 日被陈伯达强迫解散。

也许有少数单位例外，但大多数单位的劳改队在此期间被解散，直到 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重新建立。这其中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这种单位自办的劳改队。解散劳改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 3，批判血统论

血统论的猖獗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产生的背景之一。10 月 5 日，雍文涛在清华大学讲话中表示：今天能够参加大会挺高兴，大家一起讨论，对谭力夫同学讲话的批判，是捍卫十六条，执行十六条，肃清这个错误路线在一部分同学中的影响，因此呢，我们是支持的，赞成的。从此，批判血统论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部份。

陈伯达在批判血统论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在 10 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青少年都必须在阶级斗争中长期考验自己，证明自己的世界观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还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他的这番话，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出发的，完全摆脱了“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的话语系统，将不同出身的青年放到同等政治地位，为批判血统论提供了理论根据。

正如印红标在他的文章里所说的：“如果说，平反在政治上动员了与当权派有矛盾的群众，批判血统论在社会层面发动了更多的群众。”

### 4，批判“红八月”红卫兵的恶行

虽然 10 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仍然高度评价“红八月”中红卫兵“破四旧”的行为，但是民间早已开始批判血统论红卫兵所犯罪行。例如 8 月 5 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事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就已被造反派红卫兵“政法公社”所揭发批判。8 月份西安 37 中语文教师王冷被红卫兵打死的事件，也见于此时期的批判材料《王冷同志之死——看西北局、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向阳区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血腥暴行》。又如在浙江杭州的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有人揭发控诉在“红八月”中军区司令的儿子打

死人。于是有上万愤怒群众聚集军区，要求交出凶手，被拒绝，结果引发冲击军区的事件。

## **5，被迫害人员的解放**

随着销毁“黑材料”，解散劳改队，以各种形式遭到迫害的人员得到平反或事实上的解放。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全国各地广大中小学教师结束“集训”。他们在工作队进驻后普遍遭到各种形式的政治迫害，或被非法拘禁，或送往工地劳动，更多的是实行以县为单位的“集训”，被限制人身自由，遭到批斗。毛泽东批判工作组也没改变他们的命运，但在此时先后得到解放。

其他各类遭迫害人员也得到解放。典型事例如著名作家邵燕祥 1957 年在中央广播事业局被打成右派分子，1959 年摘帽。1966 年初，在广播电视剧团的“小整风”中被批判，6 月停止工作，从 8 月到 12 月，被送入广播事业局文革小组办的“政训队”中，失去自由。1967 年初，“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成立的群众组织宣布上述处分无效。邵燕祥本人也在 1967 年 4 月写了一份材料，对上述定案材料提出了意见，为自己作了辩护。他在材料中说：“正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节节胜利，才使我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产物政训队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恢复人身自由。”（邵燕祥《人生败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 **6，一些被迫害干部被解放或平反**

一些基层党政人员被解放，如我单位的工厂金工车间党支部书记马俭，在文革初期因出言不慎被送进劳改队，在此时也随劳改队解散而被解放。在邵燕祥的单位，造反派积极为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剧团团长陈庚平反。

在武汉，钢二司和三司革联的一些红卫兵，组成了“彻底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串连会”，派出人员作了大量调查，为文革初期被湖北省委诬陷为“三家村黑帮”、“地主分子”的中共创始人之一、著名哲学家李达平反搜集材料，并为此创办了专为李达鸣冤翻案造舆论的《李达问题》小报。

1966 年 12 月中旬，红卫兵发现陕西耀县山沟里有一个软禁了十几名干部的秘密集训班，就去加以解散，并把其中的重要成员送到几所大学的红卫兵手里。文革后的 1979 年陕西省委作出给这批被拘禁干部平反的决定。决定中说：“‘文革’期间，以省委名义组织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以及后来发展成的‘集

训班’，把原省委、西北局机关的一批同志打成‘黑帮’、‘反党分子’，改名换姓，弄到山区，长期隔离审查，打击迫害，是极其错误的，现予平反。”事实上肯定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解散集训班的做法。（秦越人《文革》中的“西北三家村”，张黎群、张定、李公天、严如平主编《怀念耀邦》第四集，香港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

在外交部，“造反派认为，文革初期部党委抛出三十几个人来批斗，实际上是为了转移视线、保护自己，是‘资反路线’的典型表现，所以在1967年的二三月，就把这些人给解散了，不再关押和看管。”（邢小群《回忆文革前三年——何方访谈录》，博客中国，2008）

#### 7，一些在文革初期被驱赶回原籍的人员返回城市

一位全家被驱赶出北京的中学生回忆：“1966年9月14日的下午，我们班六个红卫兵杀气腾腾的闯到我家，勒令我把全家的户口本交给他们，并发出通知：将遣送我们回山东原籍。”“二个月之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转机，使我们很快返回了北京。衣食住行暂时有了安排，在一切都是临时的施舍中度日，那种被剥夺了尊严的痛苦依然压抑着我的心，因为血统论依然没有被推翻。”（林森《历史不会忘记你们——纪念遇罗克以及反对血统论的勇士们》，网易，2005）他家于1967年9月遭到第二次抄家和遣返。

他们之所以能返回北京，是因为老红卫兵的退席和公安局在内乱中职能的弱化。等到公安局军管以后，他们就被第二次驱逐，或者说遣返。一项材料说，在1967年5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传达《遣返返京人员暂时办法》时，有一句“赶12万，回来7万，遣返走1.6万。”（杨浪《假如你被遣返了……（马文魁日记之四）》，地图的发现，2006）说明在此间回来的确实不少。

在北京市，老红卫兵驱逐居民的高潮是在1966年8-9月。而在外地，在这一时期以后仍有类似事件发生。1966年11月3日，新疆乌鲁木齐地区红卫兵总部发出（66）纠字第4号通令，要把五类分子和牛鬼蛇神赶出城市。新疆自治区党委也配合了这一行动。这一通令当时遭到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和其它少数派以

及北京地院东方红等组织的抵制。造反派抵制的出发点是他们所驱赶的所谓牛鬼蛇神可能就是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并不认为真的牛鬼蛇神不该驱逐。

（1966年11月15日康生接见新疆大学造反派讲话，见周良霄、顾菊英《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上册）

## 8，不同层次的群众踊跃参加运动

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进展，一批运动初期被打为反革命的人员被解放。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或者出身不好，或者被视为落后群众。他们迅速参加或组织造反派队伍，冲锋陷阵投入运动。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积极分子受挫，人们之间拉平了距离。特别是，批判血统论以后，出身不好、有复杂社会历史问题的人开始扬眉吐气，有了参加运动和群众组织的资格。而运动从学校、文教机关走向社会，使社会各个领域和阶层卷入文革，市民和工人从关心到参加运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础迅速扩大。

北京大学的季羨林教授将这段时期称为他的“快活半年”，不但免于被批斗，而且混迹于群众之中，到解放军高级干部家去参与抄家。他和其他一些教授后来又参加了群众组织“井冈山”，敢于向聂元梓叫板。像他这样的著名学者都积极参加运动，一般中间群众更无所顾忌了。

造反派群众组织迅速膨胀，成为多数派。“这些红卫兵组织的成员，有的是从老红卫兵中分裂出来的，他们大多数是其中的工农子弟，或原来是军干、革干、后来突然变成了叛徒、特务、黑帮、三反分子、走资派家庭的子女。一部分是运动初期处于中间状态的职员、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或小工商业者的子弟。还有一些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一向胆小文静的女生，甚至还有一批是运动初期的‘狗崽子’们，父母自杀、被关被斗、被报纸点名的‘从里到外’都黑透了的‘黑五类’。他们有的还成为一些组织中很活跃，很有实力的骨干。”（胡发云《红鲁艺》，载《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者永平主编，远方出版社，1998）

直到此时，造反派才真正形成。他们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一场反抗政治迫害的运动，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旗帜。

当然，问题还存在另一面。在季羨林的“快活半年”里，被他参与抄家的解放军高级干部就未必快活。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冲击，其中不乏好的干部。



而许多造反派领导人，一旦占据优势，掌握权力，就违背了造反初衷，也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政治迫害。此是后话。

## 9，民间思想的活跃和异端思潮的出现

一般群众感到心情舒畅，精神面貌大变。首先是劳改队解散了。而劳改队的存在对所有人是个威胁。它无须任何司法程序，随便什么人一句话就可能把你送进去。其次，现在无须战战兢兢地害怕别人告密。因为党团组织瘫痪，无处可告，而且，告密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被普遍认为是卑鄙行为，人所不齿。而更重要的是，大家普遍有一种平等的感觉，不再为当“右派”而受到迫害，为当“中派”而受到歧视。当然，“左派”有些失落感，但他们因阶级斗争那根弦不必绷得那样紧也感到放松。

剧烈的社会变动和角色转换引起了普遍的反思。

“一些运动初期因反对工作组，反对官办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反对单位领导而被打成小爬虫、反革命的师生及其他人，已被平反、解放或对他们出现争议而不再是一边倒了。这一切，与前几个月斗老师、斗同学、斗地主资本家比迥然不同，充满一种神秘紧张的气氛。”（胡发云《红鲁艺》）

“然而，‘文革’恢复了‘革命者’的真实涵义。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为‘文革’残酷的压迫与反压迫斗争复活了的当代革命者观念，并不同于建国以后流行的抽象革命观念，它已成为当代中国反抗不公正乃至专制（如在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事件中那样）的资源之一。”“它与意识形态喉舌所宣传的虚假阶级斗争观念（地富反坏右）有着深刻的区别。”（尤西林《文革境况片断》，《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者永平主编，远方出版社，1998）

直到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在很多人看来，是荒唐的，不可思议的，无法接受的。但是，对于许多对文革前整个社会运行逻辑持怀疑态度的人，深深感受到社会不平等的人，遭受历次政治运动打击迫害的人来说，这样的运动却是他们早已盼望的、等待已久的。

广州一位张姓中学生就是这样的人。他说：“我感到似乎在等待一场暴风雨的来临，尽管我不知道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风暴。”（阿妮达·陈《毛主席的孩子们》，史继平等译，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

当年只是贵州一座小城的教师的钱理群说：“文革对我来说并不突然，文革前，懵懵懂懂中，我就有一种预感。”他又说：“随后开展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特别是对‘驯服工具论’的批判，‘造反有理’及‘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等理念的强调，对我来说，是对自己长期以来心存疑惑的许多问题的一个解答。”（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腾讯网，2008）

这就形成了一个舆论空前宽松的时期，一些“异端”言论出现，一批观点各异的文章和大字报得以发表，包括那些反对这次运动的大字报。虽然它们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and 政策的框架内，主观上或许是为了维护和发展毛泽东的文革理论而写作的，但是其中却潜伏涌动着自由思想的潮流。其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以后发生的“二月逆流”、“二月镇反”、“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等运动都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这一潮流的。

### 三、对“十七年”问题的触及

因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名称的荒谬、不伦不类，所以很多文革历史著述众口一词，说根本不存在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革前一直是这样干的。这话不是没有道理。派工作队是中共搞政治运动的传统。在党委或工作队领导下，将群众划分为左中右分别对待也是惯常做法。即使不搞运动，群众也被分成左中右。如果运动来了，这样的分类就更加具体。文革开始后，无论是党委还是工作队当政都按历来实行的方法办理，对辖下的百姓进行排队。因此，当这种传统做法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被否定时，就有一个对“文革前的反动路线”进行反思的问题了。这个问题，不但不少群众组织提出来了，文革领导人也不止一次提出。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对文革中一些现象不理解，重要原因之一是对文革前的社会状况不了解。

在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实际上已经触及到文革前的一些问题。

#### 1、文革前的政治生态——“党支部专政”体制遭到打击

文革前的基层政治生态，基本上是一种党支部专政体制。自从反右斗争中许多人因为对党支部不满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党支部的权威如日中天，产生

了两种很特别的现象。

其一是形成一种政治等级结构，即在平时即按政治态度和与党支部关系的亲疏将所管辖人员划分为左中右。待政治运动来临时，三类人员自然分别成为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和斗争对象。这种等级的划分是刚性的，即通过自身的努力很难改变，特别是其中被划为右派的人员。如我单位在文革初期批判一些给党委贴大字报的“反党分子”时，一些平常被认为不很先进的人员也参与批判，有些人态度激昂，就被领导认为是别有用心。也就是说，他们虽然不能跟着被批判的“反党分子”向党进攻，也不能表现太积极，只能跟在“左派”后面摇旗呐喊，不能僭越。

其二与前者相关。为了区分左中右，就须掌握所有人的思想动态。为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告密网，专门收集每个群众的一言一行，逐级上报，并以此作为是否“积极靠拢组织”的标准，当然也作为升学、入党、提级、提干的标准，并由此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今后的命运。笔者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班上只有二十来人，就有两位同学中了这样的暗箭，被汇报说他们讲了反动话。其中一位讲的话被大会批判，毕业后被发配至很远的地方，另一位在文革中倒了霉遭了罪。这种告密行为到了怎样无孔不入的程度，可以举一个例子。那时，由于普遍的贫困，人们上厕所经常不用专门的手纸，而用写过字的废纸，例如比较薄的有字的信纸。于是有人专门如厕检查这种用过的厕纸，如见违禁字句，或表现“不健康思想”的文字，即呈上以邀功。笔者所在单位在文革开始时就有这样的事例发生，否则我也不会相信世界上有如此齷齪的事。所以，对这个告密网的恐惧足以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而借助于这个告密网“靠拢组织”以谋求个人前程也成为该告密网运行的动力。

这两种斯大林体制特有的现象，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遭到沉重的打击。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公开斥责：“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荒谬地把自己本单位的领导，同党中央，同整个党等同起来。他们利用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党的热爱，利用一些群众不明真相，提出什么保卫本地区、本部门的党委的口号，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社论明确宣布：“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

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中央’，‘反革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各地群众到处都将本地或本单位的党委贬称作“黑党委”、“黑市委”、“黑省委”（甚至一些领导干部所写的检查交代中也这样称呼），没有谁会认为这是“反党”。

后来的工宣队时期曾一度恢复“党的一元化领导”，但效力远不如前了。

## 2，对“党的不好作风”开始一定程度的反思

1966年11月12日陶铸接见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在谈到档案问题时，他说：“我们党有些不好的作风没有去掉，我参加革命四十年，还没有解决。工作组来时就排队摸底整材料。这由来已久，过去教条主义从苏联带来的，是特务作风！要破四旧！毛主席最反对这一套！”“过去搞档案是苏联的，只看缺点，一句话一个字就记下来，日积月累，问题就大了，什么排队、鉴定、思想动态，思想分析都是错误的！有人讲错几句话，可恰恰是革命的，有人规规矩矩，不声不响但确是保守的。中央想把这个东西彻底改变，把旧东西统统搞掉，把过去的坏东西统统搞掉！”（周良霄、顾菊英《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上册）

11月16日陶铸接见另一批外地串连学生时说：“我们还有些错误的东西，如保卫工作、组织工作还受到苏联格别乌的影响。”“过去的一套是不相信群众，搞什么排队，听到一句话就记下来归档案了。”（同上）

1967年1月3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外语学院代表时，有同学说，工作组利用过去的思想汇报或党团组织生活会上的汇报拿来整人。周恩来摇着头说：“我看这个办法很不好。这不是群众教育自己，这是党内生活不健康的東西，这不是我们党的传统。我调查了一下，是从莫斯科学来的，加上安子文搞了二十多年组织部，刘仁搞了北京市委，这种现象很严重。所以刚才谈这一点，很触动我的思想。这是党内很坏的东西。”（同上，中册）

周恩来还有一次对中国科学院的代表说：“斯大林的党不如列宁的党。列宁的党是生动活泼的。”（根据当时传达）直接对斯大林体制提出质疑。

没有理由说他们这些讲话是违心的，也没有证据说明他们这是在“引蛇出洞”。这些讲话提出了过去四十年没能解决的问题，即斯大林体制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这些讲话的影响也是长远的。它所否定的不仅是刘少奇、邓小平，而是否定了长期以来的政治生活体制。不仅否定了以前的左中右的划分方法，也否定了分类结果。“靠近组织”、勤于汇报者未必很先进，特立独行、经常说怪话者也不一定落后。

虽然文革领导人提出了“过去的坏东西”问题，但没能进一步展开。群众性的批判活动多涉及现实政治问题。高层领导人对政治生活中的斯大林体制的批判如昙花一现般出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特殊的时期里。如果这一运动能继续深入，也许能开展进一步的讨论，甚至能引发一场启蒙。但是随着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进行，特别是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后，告密之风再度大盛，以言定罪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 **3，一批政治旧案被提出并得到重新评价**

既然可以对文革前的政治生活进行反思，就不可避免地触及了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况且，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在历次政治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但是，建国以来，从镇反肃反到整风反右，三面红旗，凡是大的政治运动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之下进行的，谁敢否定历次政治运动？所有造反派，不管多么激进，都不敢不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所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由造反派提出重新审查的旧案，基本上具备的条件是：这些案件的经手人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在文革中都被打倒。这些翻案活动基本发生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即1966年底到1968年初，到清理阶级队伍时结束。一些翻案活动在日后受到清算，所以绝大多数翻案活动在文革中均未产生任何实际结果。

**四川“刘、张”案。**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及与之有关的一批干部如王茂聚、郭林川等，在文革前受到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处分，文革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此案被红卫兵上报中央，被毛泽东选中作为打倒李井泉的“突破口”，1967年4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四川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平反的通知》称：“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委刘结挺等同志的案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并指示周恩来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找双方有关人员来京，加以处理。”中央认定刘结挺、张西挺等是“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同志”，他们

的案件是“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随即刘、张、王、郭等均以“革命干部”姿态登上四川省文革舞台（不久又相继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抛弃）。

**四川“萧、李、廖”案。**文革初期，在四川省已遭处理多年的反对“三面红旗”的“萧、李、廖”（重庆市委前组织部长萧泽宽、前副秘书长李止舟、前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廖伯康），又被重新抛出来作为阶级斗争的靶子。到了1966年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各级党政机关瘫痪，萧、李、廖等人才得以脱身上北京告状。当时以北京地质学院一批学生为主，帮助他们向中央申诉，要求翻案。这些学生查阅了档案，发现他们这些所谓“反党黑帮”完全是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诬陷的，因此对他们大力支持。但中央文革对他们一次次报送的申诉材料却始终不予置理。后来，“无产阶级司令部”更是明确表示了不准为过去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老干部翻案的态度。萧、李、廖等人再次被关进“清理阶级队伍”的集训队，与当年批判他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一起，遭到“斗、批、打”的残酷折磨。（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炎黄春秋》2003年第九期）类似问题还有遭到迫害的川东地下党问题。

**四川“五八劫”。**1958年反右以后，四川省领导独出心裁，在应届毕业生及部分其他年级中学生中搞了一个大鸣大放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违背团中央关于在中学生中只搞正面教育的指示，实行大鸣大放、引蛇出洞、批判斗争，将学生分类排队，对三、四类学生，特别是四类政治不及格的学生，包括很多未成年人，进行政治迫害。这些学生虽然未带政治帽子，但是通过一些官方文件，将他们限制使用，被视为异类，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和四类分子同等对待。当年的全川应届毕业生不到一万人，但被定为三、四类，送各厅局变相劳改的就有3200多人，连同其它年级的三、四类，总数达万人以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四川这批遭到“五八劫”的学生又一次被抛了出来，当作“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批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他们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奋起反抗，组织了“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联络受难同学，进驻了共青团成都市委。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彼此对立的不同造反派的共同支持。他们在1967-1968的一年里，查阅了大批资料 and 文件，听取了当事人的控诉，了解了事实真相，撰写文章，揭露、批判这一骇人听闻的罪行。他们组织了各种形

式的会议，以揭发“李廖死党”为名，对当年的省市组织这一运动的干部进行批判斗争。许多干部写出了揭发材料、认罪书、检讨书，承认错误。但是在 1968 年以后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这批人员又再次遭到迫害，并追究他们的造反翻案行为。（王建军《五八劫》，2007；李临雅《高中生遭遇“模拟反右”，《炎黄春秋》，2008 年 7 期）

**广东“双陈”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广东的造反派揭发出 1951 年的广东公安部门的“双陈”案问题。“双陈”指原广东公安厅长兼广州公安局副局长陈泊和另一副局长陈坤，当年说他们包庇“国际间谍”梁侠（实为驻香港特情人员）。1951 年 1 月，从北京赶来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宣布逮捕陈泊。同时陈坤也被捕。又在广州市公安局逮捕 300 多人，广东省公安厅系统则逮捕 700 多人，严刑拷打逼供。后来解到北京审讯时，案犯挤了满满两车厢。此案历时两年才结案，对陈泊，以“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陈坤因不堪虐待，在 1952 年 10 月就已死于狱中，也被判处 8 年徒刑。当年审判“双陈”案的公安部人员也因认为不存在特务集团而被错误处理，赶出公安队伍。（《撩开案情厚重帷幕，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冤案》，《文史精华》，2005 年第 5 期）此案称为建国以来公安系统第一冤案，直到 1982 年才平反。文革中打倒了罗瑞卿，广东的造反派在 1968 年 1 月重提此案，还成立了“双陈”专案组。他们提出：“我们要通过对‘双陈案件’的调查，揪出罗瑞卿的黑爪牙，为无辜受害的干部和因坚持正确路线而被迫害的革命干部彻底平反。”此案在文革中没有结果。

**广东反地方主义问题。**“双陈”案是在广东反地方主义背景下产生的。50 年代，陶铸在广东先后领导过两次反地方主义运动。第一次是反方方，第二次是反古大存、冯白驹，几万地方干部受到株连。十年来，“地方主义”成了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当陶铸被打倒以后，一些群众组织和地方干部便纷纷提出翻案。在广州地区，最早提出为地方主义翻案的是属于造反派的八一兵团。1967 年 2 月 7 日，八一兵团在其主办的小报《红工农》创刊号上提出了陶铸与古大存的矛盾和地方主义问题。一些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被批判的干部也进行了串联。他们还想成立一个组织。2 月 15 日，一些干部发表了告全省干部公开信《放下包袱，

挺起腰杆，投入战斗，挖掉陶铸、赵紫阳在广东统治的黑根子》中，批评当年反地方主义运动“两面三刀，排斥异己，顺我者存，逆我者亡”，并为在 1966 年 11 月去世的古大存鸣冤叫屈。“两派群众组织的态度，大致上，东风派反对翻案，红旗派支持翻案。”（一听《文革杂记》，《关天茶舍》，2002）在双方组织的支持下，6 月底就地方主义问题，在广州举行一次公开的“高官辩论会”。红方代表为尹林平，黑方代表为林李明。尹林平为省委书记，是为地方主义翻案的带头人物。

**福建老区问题。这是与广东“反地方主义”问题类似的旧案。**福建原革命老根据地（主要是山乡农村）及一些原地下党、游击队活动的地方，文革前十七年一直处于贫困状态，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这些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组织起了一些造反组织，当时统称为“老区组织”，他们的主要批判矛头就是对准文革前十七年的一些问题。1967 年 3 月，福州军区曾一度将一些老区组织打成“右派组织”、“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在 4 月又按中央精神进行了平反，并宣布：“过去，有一些地下党的干部，和坚持打游击的干部，长期以来受到叶飞为代表的福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打击和迫害，有些人在平反以后，仍然受到压抑，现在起来造叶飞的反，是完全应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文件《关于老区问题的几点意见》，1967 年 7 月 13 日）韩先楚在讲话中还说：“叶飞在这里统治十七年，叶飞一小撮人不仅对军队、对农民也采取打击的办法，什么拔白旗、插红旗呀！打到农民头上了。搞水库，搬家，钱扣得死死的，他自己盖楼房，没有用到农民身上去。老百姓搬个家背井离乡，告状一直告了很久。还有破坏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等一系列罪行。农民为什么要打倒他，有气嘛，他们要算叶飞十七年的账。”（1967 年 6 月 3 日《韩先楚在福州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关于老区问题的讲话》）

**一些右派分子提出翻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日，是几乎所有右派分子暗自高兴之时。其中一些人认为翻案时机已到。

在西北劳改的右派分子张贤亮说：“原先整人的人和曾被他整的人混到了一起，不分大小高低，重新洗牌，这时我仿佛也有了革命的快感，正如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唱的那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也曾是右派分子的作家王蒙在他带有很强历史纪实性的小说《狂欢的季节》中，反映了当时一些右派共有的情绪：“作为摘帽右派的苗二进居然可以大模大样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居然可以用‘居心叵测’‘残酷迫害’‘是可忍孰不可忍’‘欠了人民的债’等言语批判工作组，直到批判了‘御用红卫兵’……”原来被踩在脚底下的人有了说话的权利。

湖南的《新湖南报》右派集团被认为是一个冤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们提出翻案。当时还成立了一个翻案联络站，翻案联络站后来出了三期报纸，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当时省革筹一些人也表示赞同和支持。报社内部掌权的造反派说：“你们确实是冤枉的。我们造反派，不像那些走资派，我们要给你们平反。”但后来形势变化，他们不再支持。

四川成都的右派分子彭慕陶则同几个难友到北京上访，中央文革接待站的人听了他们对自身遭遇的汇报后回答：“毛主席党中央当时反右派，主要指那些心怀不满与和共产党较量的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像你们这些人都是党的基本群众，根本不应该划为右派分子，这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造成的，现在你们就应该依靠当地的革命造反派起来揭发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并给他们开了给四川省革筹组和革命群众组织的介绍信，还发了返程火车票。回来后，因中央文革接待站的介绍，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在文化宫给他们提供了办公室和笔墨纸张，他们写了一些揭露当年单位上领导人如何颠倒黑白将他们打成右派的材料，展开“革命大批判”。但在后来的“清队”、“一打三反”中他们的活动被打成了“右派翻案集团”。

（彭慕陶《文革中所谓〈成都右派翻案集团〉真相》，载《往事微痕》第7期，2008年10月5日）

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不少右派或摘帽右派提出翻案，但随着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开展，他们又被收入劳改队。

---

【史林一叶】

### 文革中亲属同遭专政机关杀害的案例

方子奋先生在《南京“12·10”公判四十年祭》一文中（见《记忆》2010年第22期），饱含激愤之情谈到在南京“一打三反”运动中母子同遭处决的事件。方先生写道：“这对母子，正是我年仅26岁的挚友李立荣，和他六十岁的母亲林舜英。”方先生感慨说：“古今中外数百年来，从未有过同时处决母子政治犯的案例，那一天的公判大会，给了十万观众大饱眼福的机会。也给当代历史创造了一项‘中国之最’。”

过去中国古小说和传统戏剧中，常有“满门抄斩”、“诛九族”的说法。不过，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这种“满门抄斩”、“诛九族”，也随着满清王朝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不料，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这种近似于“灭门”的同时处决一家亲属的作法，竟然“以革命的名义”复活了。

以笔者掌握的资料，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北京，早于南京几个月就出现过类似的夫妻被同罪处决，父子同场被处决的“中国之最”。

### 夫妻同杀——王守亮、杨淑辰夫妇

文革中，当局以法律名义、用国家机器对一家亲属同时判处并执行死刑的，不同于文革初期在“文革思潮”及“暴力文化”作用下的群众暴力行为造成的情况（如北京大兴县及湖南道县的杀“黑五类”全家）。

1970年初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对北京25中教师王守亮、杨淑辰夫妇的处决，是笔者所见资料中最早的一例。略有不同的是，夫妇两人的处决，是一前一后相隔了两个多月。

最先被处决的是妻子，48岁的杨淑辰。对她的处决，是在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正式下发之前，北京市的“一打三反”运动还处于“预热期”的1970年1月27日。

笔者在《遇罗克的处决令是谁签署的》一文中，提到过的“北京市公法军管会”于1月9日发布的那份《通知》所列的20人名单，排第一位的就是这位杨

淑辰（名单上遇罗克排第 10，另两位著名“女性文革思想者”王佩英排第 11，马正秀排第 15 位）。在《通知》正文中，还特别提到，“现将杨淑辰等二十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组织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云云。

在这份《通知》上，当局介绍了杨的身份及“罪行”，全文如下：

一、现行反革命犯杨淑辰，女，四十八岁，北京市通县人，地主出身，国民党党员。其母系地主分子，被遣送原籍。

杨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杨犯于一九六六年充当外国特务，大肆盗窃我国机密情报，书写反动文章，并领取了大量特务活动经费。仅一九六七年三月杨犯出卖情报数百份，同年四月向外国驻华使馆人员递交情报时，当场被我抓获。

看来，当局将杨身份定为“外国特务”，“罪行”是“向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出卖情报”。笔者曾在《遇》文中对此表示质疑：杨一个无业无职的普通中年妇女（笔者当时尚不知其夫是普通中学教师），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在一月内（1967 年 3 月）窃取数百份“我国机密情报”并出卖。其时，全球尚无电子文本，任何情报都是纸文本。机密材料一般十数页或几十页，几百份材料须装几大箱。要在一个月之内窃得数百份机密文件并完成转手“出卖”，以一个人之力，即使是美国中情局或苏联“克格勃”的超级特工，也不可能做到。何况一介无职无权、无特殊背景的普通妇女。她从哪个途径或渠道，能一月内窃取几百份“机密情报”？

因此，笔者在文中推断，这位杨淑辰出卖给“外国驻华使馆人员”的所谓“机密情报”，不过是当时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文革小报、传单和其他文革资料之类。杨收集来向驻华使馆人员售卖并因此被捕。“一打三反”运动正式开始前，北京市奉命为全国树“样板”，杨也作为“反革命犯”典型，被定性为“外国特务”惨遭处决。

（本文完稿后，有幸从《记忆》上读到周七月先生的文章，证实了笔者的推

断。3月5日与遇罗克一起在北京处决的19人中，有一对情人，他们是北京挑花厂的医生、医士田树云和孙秀珍。2月11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通知》中，当局给出的罪名是，“窃取我大量重要情报，先后在国际俱乐部、友谊商店等处，由田犯掩护孙犯将反革命信和情报投入外国驻华使馆汽车内十九次”云云。周七月关押中与田、孙相识，与田尤熟。周七月在近著《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记忆》2011年第1期）中说：“以他们的职务（挑补绣花厂医生和医士）和社会地位，不可能接触到罪状名单上公布的所谓‘窃取我大量重要情报’。”又说：“据田树云说，他们投递到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馆汽车里的仅仅是社会上公开卖的红卫兵报和首长讲话之类。”杨淑辰卖的所谓“情报”，亦应是此类。）

1970年1月27日，这位杨淑辰与材料上除遇罗克之外的19人（包括王佩英、马正秀），在北京当局10万人公审大会后被处决。

之后的3月24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发出了当年的第三份类似《通知》。让人没料到的是，这份《通知》中，杨淑辰的丈夫，北京市第25中教师王守亮也“榜上有名”。

北京市第25中，虽不如高干子弟云集的第101中学、北京4中一样是首都名校，文革中却一度十分出名。甚至被一些史家称为“上山下乡”运动的“策源地”。文革高潮期的1967年7月，北京25中高三学生曲折（上山下乡时改的名字）发出一份创办“红卫兵大学”倡议书，两天内，有300多人报名。正式“上山下乡”时仅剩10余人，被安排到内蒙古锡林格勒草原插队落户。当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发文赞扬此“革命行动”。此事被视为文革中知青下乡运动的先声。第二年底，《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全国正式掀起了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通知》中对王守亮身份及“罪行”的介绍，几乎就是其妻杨淑辰“罪行”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

**五、现行反革命犯王守亮，男，四十七岁，山东省人，地主出身，系蒋匪军上尉军官、国民党员，原北京二十五中教员。**

王犯自一九六六年以来，伙同其妻杨淑辰（外国特务，已处决），大肆盗窃、

出卖我国机密情报，书写反动文章，仅一九六七年三月，王犯就伙同其妻出卖我国重要情报数百份，并领取了大量特务活动经费。

看来，当局认为仅仅将杨淑辰处决，似乎还不够，还未能充分显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于是这次将其丈夫王守亮株连治罪。而且，特别在简介中注明，其妻杨淑辰系“外国特务，已处决”字样，表明了这种株连治罪，必须“重罪施重刑”的意图。

笔者收藏的这份经某位权势人物批注过的《通知》原件上，这位王守亮所谓“罪行简介”后，被黑笔批有“死。”字样，表明将之正式列入下一批处决名单。

由此，可以认定，这位北京市 25 中教师，与“北大才子”沈元等，于 1970 年 4 月 18 日北京市当年第三次集体处决行动中被处决。离其妻杨淑辰被处决，相距两个月零 21 天。当局至此完成了“夫妻同杀”之举。

也不知这位北京中学教师王守亮、杨淑辰夫妇有无子女？子女其后遭遇、经历如何？王、杨夫妻两人此案文革后是否得到“平反”？深望知情者提供相关信息。

### 父子同杀——侯坤、侯建民父子

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另一起类似案例，是北京通县的侯坤、侯建民父子两人，于 1970 年 3 月 5 日被同时处决。

北京市公法军管会于 1970 年 2 月 11 日发出的当年第二份《通知》中，有其父子二人的情况及“罪行简介”。全文照录：

九、现行反革命杀人犯侯坤，男，五十二岁，北京市通县人，系反动资本家。

现行反革命杀人犯侯建民（侯坤之子），男，二十三岁，北京市通县人。

反革命杀人犯侯坤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长期在其家埋藏铅二千余斤，并散布反动言论，向其子女灌输反动思想。侯犯为对抗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唆使其子，反革命杀人犯侯建民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六日夜，将其家中八口人全部砍杀和威逼跳井、跳水坑致死。

笔者认为，侯坤、侯建民这个案例，应算是文革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有双重研讨价值。所说“双重研讨价值”，一是说其作为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父子同天同场被处决。二是侯氏父子杀人“罪行”，发生在1968年5月，而且所杀及所逼其自杀者，均为自己家人。

其时正是中共搞的“清队”运动大规模开展之际，出身资本家的侯坤，是迫于“清队”运动的恐惧，况又被抄出“长期在其家埋藏铅二千余斤”的“罪证”，不惜让全家人集体赴死的。此案由此也成为了研究“清队”运动中，被清对象决心“自我寻死”作为全家人最后“出路”的典型案例。侯坤是资本家，也算有知有识阶层，身上肯定有古代士大夫阶层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理和意识。其家躲过了文革初期的群众暴力，却躲不过其后的“清队”。当然，更躲不过再其后的“一打三反”。显然，侯氏父子，在杀了家人（或逼家人投井跳水坑自杀）之后，其两人也是打算身死的。

但不知何种因素影响，父子两人未及自杀，或相互杀死即被捕。但在狱中足足关押了近两年，才被当局在“一打三反”中拉出来同时处决。

笔者保存的那份2月11日《通知》，亦是被权势人物批注过的原始文本，侯坤、侯建民父子“罪行简介”之后，黑笔批有“死刑”二字。在姓名之前，亦被红笔划了“√”记号，表明为已经决定处决（可见所谓交群众讨论实属当局走过场）。

1970年3月5日，侯坤、侯建民父子，与遇罗克、顾文选等人一起被处决于同一个刑场。

### 马正秀夫妇：另一种形式的“灭门处决”

马正秀，女，1931年出生，原籍重庆市，是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一位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女性。其丈夫赵光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著名作家艾芜的学生。

艾芜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赵光远在 1940 年代是他当年在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中共地下党员。曾听过艾芜在“社会大学”讲文学课，并在重庆《大公报》上艾老主编的《半月文艺》上发表过散文。1950 年代初赵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因病退伍后，是艾芜帮他在北京找到工作，即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戏剧编辑室任编辑。1960 年代初，赵曾担任过在全国影响甚大的剧作家孟超的剧本《李慧娘》的责任编辑。

马正秀在文革中因反对乱批乱斗，反对打倒一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反对打倒共和国主席，于 1967 年 9 月 16 日被捕，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在狱中马正秀也始终拒绝认罪。由此，在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正拟拉开帷幕时，其与遇罗克、王佩英等“文革思想者”一起，上了北京市公法军管会 1970 年 1 月 9 日《通知》所附的 20 人名单。该《通知》对马正秀的介绍如下：

十五、现行反革命犯马正秀，女，三十八岁，四川省人，商人出身，学生成份，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其父系历史反革命分子，其长兄系军统特务被我镇压。

马犯思想反动透顶，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马犯多次书写和公开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马犯在押期间，仍疯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这份名单上的 20 人，都是当局内定的“处决犯”，《通知》发出后仅十多天的 1970 年 1 月 27 日，除遇罗克一人因故暂时“刀下留人”外，马正秀随其余 18 人一起被处决。

从《通知》上的文字介绍看，马正秀的亲哥已于 1950 年代初的“镇反”中被处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马正秀的丈夫赵光远，已于一年前的“清队”运动中，在所谓“工宣队”进驻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于 1969 年 3 月 15 日，因妻子马正秀被捕及所谓“社会关系复杂”，遭到审查拘押。不堪压力，从四楼上跳楼自

杀身亡。作为妻子的马正秀，又惨遭处决。由此，笔者认为赵光远、马正秀夫妇遭遇的是另一种形式的“灭门处决”。

也不知赵、马夫妇有无子女？马正秀被处决后其子女遭遇如何？老作家艾芜文革后曾著文《夜深我走在北京的街头》，深情缅怀追忆这对年轻的“文革遇难者”，感叹他们遭遇的不幸。

1980年2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对马正秀一案做了改判。1981年秋，重庆市与北京市公安局在重庆殡仪馆联合举行马正秀追悼会，为其彻底平反。

著名诗人屠岸，曾是马正秀丈夫赵光远的同事和好友，两家有十余年的交往。屠岸先生于2000年底发表长诗《迟到的颂歌》，这首68行的长诗，全诗就是献给马正秀的。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三十年前一个凛冽的寒夜里/罪恶的枪声响了，她倒在血泊中！”“啊，布鲁诺、张志新式的女英雄，/让我用歌声伴你到永久，马正秀！”

### “镇反”运动中一家三口跪成一排被处决

笔者在《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一文中，谈到一直被当局尘封了几十年的一桩史事——毛泽东在“一打三反”中说过：“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

其实，从“镇反”运动和文革中对所谓“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的各类处决事实来看，一直以来，都是在“靠杀人来统治”（当然还借助范围更大的“劳改”和“劳教”）。

笔者收藏的资料中就有，中共执政初期的上海市，在“镇反”运动中陈小毛（父）、张金庭（母）及陈磊（子）一家两代三口同场被处决的图片资料。时间是1951年4月30日，地点是上海市郊某刑场。

临刑前的照片显示，夫、妻、子三人被反缚双手，从左到右跪成一排，头顶上高插着特大的写着其“罪名”的“死刑标”。当局给出的罪名分别是：父陈小毛，“特务、汉奸、恶霸”；妻张金庭，“特务帮凶”；子陈磊，“特务、汉奸”。（见《上海公安画报》第2期）

其实，这陈家两代三口，仅是当天全上海被处决的285名“反革命分子”中的三人而已（另有资料说上海市当天处决数为294人——《建国以来大事纪实》



第 94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年 5 月）。1951 年 4 月 30 日，（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将被判处死刑的 285 名反革命分子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此前两天的 4 月 27 日深夜 12 时（实为 28 日凌晨），在“上海市镇压反革命行动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上海当局出动 3.5 万名军警、干部，及工农、学生组成 4445 个行动小组，实行全市性大逮捕（捕人数不详）。两天后即有这次“大处决”（见山西《党史文汇》1997 年第 8 期）。从被捕到处决，其间仅两天（有的甚至不到两天），可见未经认真证据收集及审讯，几乎是即捕即杀。

“二战”后非战争状态下的和平时期，一个城市一天处决 285 人（或 294 人），不知是否是创造了一个方子奋先生所说的“中国之最”，或者说是“世界之最”？此前，人民共和国的“处决纪录”是一个月前的 3 月 5 日，北京市处决 199 人。3 月 29 日，天津市处决 193 人（《建国以来大事纪实》第 93、94 页）。“上海纪录”出来后，北京市又于 5 月 20 日至 22 日，三天分批处决 221 人。不过，仍未能赶超“上海纪录”。

关于上海“镇反”成果，资料显示，仅高潮期“自 1950 年 10 月中央下达‘双十指示’至 1951 年 10 月，一年间，（上海）全市共逮捕反革命分子 25100 余名，其中依法被判决死刑 2546 名”。（见山西《党史文汇》1997 年第 8 期）。

大概为了显示“镇反”对社会的震慑力，在死刑执行前几分钟，将陈家三口单独跪成一排照了一张照片，而且是“特写镜头”。然后发表在《上海公安画报》上，向社会公布。

笔者曾多次审视这张照片。惊奇地发现，即将被处决的父母子三人，竟然表情相当平静沉稳。既没有通常所见临死前的激烈挣扎甚至反抗，或大喊大叫，也没有被吓得半死，缩成一团。三人都是直起腰跪在那里，任行刑队士兵在身边忙活。尤其是父亲陈小毛，那脸色之平静，超乎想象。只有妻子张金庭神色阴郁，多少有点怒目而视的样子（也许她平时就是这神情）。儿子陈磊大概 20 多岁，眼神多少有些茫然，身上穿的竟然是当时的“干部服”（可能被捕时即如此装束）。

中国历代的“灭门”，大都是杀男不杀女。被株连对象，是年满一定年岁的男丁，而家族中的女人，是没为“家奴”，或发配充军之类。“毛泽东时代”的“灭门处决”，却是“男女平等”。不管是夫妻，还是母子，只要定性为“反革命”，

一律“格杀勿论”。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到底发生过多少这样的案例，恐怕已经很难统计了。

2010年12月18日于自贡危楼书屋

---

## 【风云人物】

### 康生的另一面

#### 余汝信

康生（1898-1975）是文革期间中共极为重要的核心领导层成员，同时，也是一个至今尚未研究透彻的人物。

一九八〇年十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如此评价康生：

“康生，一八九八年生，一九七五年病死。山东省胶南县人。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在上海做白区党的工作和特科工作。一九三三年七月去苏联，当王明的副手，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一九三四年初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七年冬回到延安以后，历任中央社会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四七年曾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区搞土改，后留山东工作。一九五〇年后长期养病，六年未做工作。党的‘八大’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组织写‘九评’等文章，并做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九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十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副主席。

“几十年来，康生这个人一遇适宜的政治气候，就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善于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在党内兴风作浪；屡屡利用职权，捕风捉影，捏造罪名，陷害同志。由于他惯于耍反革命两面派手腕，长期掩盖了其阴谋家，伪君子的本相，历史上欠的许多账一直没有得到清算。‘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的丑恶面目

充分暴露。从运动一开始，他就与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勾结在一起，积极出谋划策，残酷迫害干部，从政治上、组织上、理论上竭力制造混乱，进行了一系列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民愤极大。”

该《审查报告》列举了康生的五大“主要问题”（即“主要罪行”）。其第二大“主要问题”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捏造罪名，蓄谋陷害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审查报告》称：

“‘文化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康生一直伙同林彪、江青等人，紧紧把持中央专案工作的大权。在中央专案第一、二、三办公室，由他分管的彭真、刘仁、陶铸、贺龙、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王任重、林枫、‘新疆叛徒集团’、‘苏特’等专案组，据现有统计，‘审查’对象达二百二十人。对其他三十三个专案组（包括刘少奇、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周扬、小说《刘志丹》等大案），‘审查’对象一千零四十人，他也参与谋划，直接控制。中央专案第一、二、三办公室，十年中陷害了成千高级干部，康生都负有罪责。

“从档案中查出，许多冤、假、错案都是由康生点名批准、指使逼供，以至定性定案的。据现有确凿的材料统计，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诬蔑和迫害的干部竟达八百九十三人（包括曹轶欧点名诬陷的一百二十二）；在康生亲自审定的报告上点名诬陷的有二百四十七人。被点名的八百三十九人中，有中央副部长、地方副省长、部队大军区以上的领导干部三百六十多人，其余的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其中，已查明被迫害致死的有八十二人；致残致病的，则无法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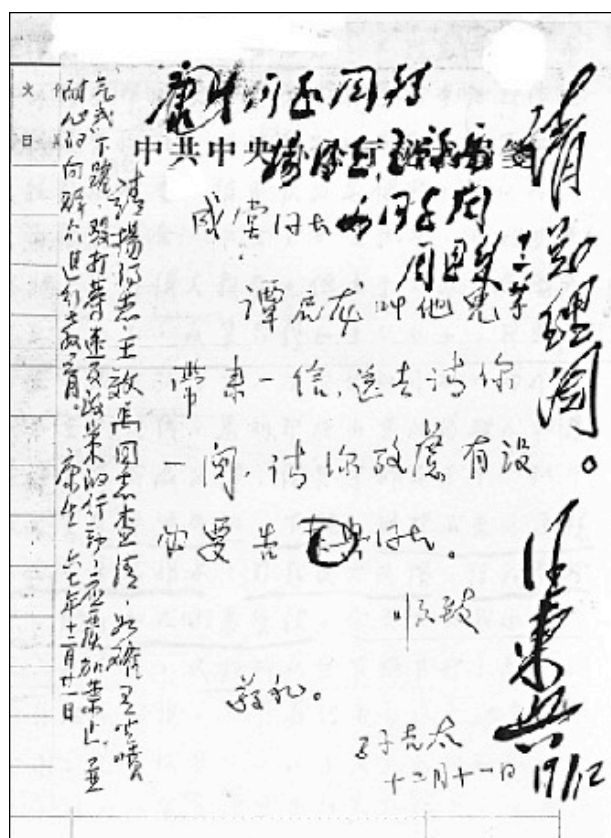
笔者最近读了一些有关康生的材料。这些材料中的相当一部分，可以看到与官方上述判定不同的康生的另一面。这些材料，似应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康生，以及全面认识其在中共高层的同僚。本文仅举三例如下。

## 一、关于谭启龙的批示

谭启龙（1913-2003），1967年1月前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兼任济南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政治委员。1967年11月间，经周恩来同意，原在北京受到保护的谭启龙，回到山东接受批判。

12月初，谭启龙给中央办公厅负责与他联系的孙吉太写了一封信，叫他的儿子带到北京。信中称：回山东已二十多天了。回来第三天（十五号）就要我作检查交代，我要求先见见王效禹同志，希望得到指示帮助未允，要求推迟检查让我作些准备亦没有批准。因此只好以我原在京写的学习总结改为补充检查。结果认为是假检（查），真反扑。后来即接受大会、中会、小会批斗，开始进行得很好，受到很大教育。但由于大家一定要我承认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思想上不通，只承认忠实、顽固地执行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刘、邓在山东的代理人 and 忠实走卒。引起革命派义愤，结果于昨夜开中心组批斗会议，实行坐喷气机，下跪，我提出意见这样做不合乎主席指示，引起更大义愤，给我拳打脚踢，……因此，我只好写信简单告知你，希你转告汪主任一下，我当前处境较困难，可否给我一点帮助请告知。

谭启龙的这封信，有幸还是转到了汪东兴手中。汪东兴于1967年12月19日批示：“请总理阅。”周恩来次日简单地批了几个字，转请负责山东问题的康生处理：“康生同志阅转杨得志、王效禹两同志阅。”



康生看到谭启龙这封信后，其批示是具体、负责的：“请杨得志、王效禹同志查清，如确是坐喷气式、下跪、殴打等违反政策的行动，应严加禁止，并耐心的向群众进行教育。”

康生的这个批示，并没有丝毫“诬陷”、“迫害”的痕迹，相反，是保护谭启龙的态度。

文革结束后，谭启龙写了一篇题为《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的关怀与保护》的文章，提到了这一段历史。唯文中称：

“我回济南前，总理派人向我转达，只去两周时间，东西不要带回去。并向王效禹交代：只准文斗，不准武斗。然而，王效禹大耍两面派，当面答应总理，回到济南，对我批斗更凶了。除了大会批斗之外，小会轮番斗，不时被一群群的人拉到黑暗的小房间饱以拳脚。我终于被打成了重伤，躺在床上不能平卧，只能长时间地趴着，经常呕吐黄水。这次王效禹等造反派是下了决心的，‘政治上斗不垮，就把身体斗垮’。那时大会小会批斗我倒不怕，就怕被人拖进小房间殴打，万一发生不测，造反派反咬一口说‘畏罪自杀’，那什么事都说不清了。因此我下决心一定要向周总理报告。

“在有关同志的帮助下，我与大儿子见了一面，要他代我写了一封详细的信，通过中办同志转交给周总理。

“这封信很快到了总理手中。总理读后，即打电话给王效禹，责问为什么打我。当王抵赖时，总理严厉地批评了他。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总理又当面批评他：‘你们不按我交代的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错误的。’

“为了确保我的人身安全，总理具体指示杨得志同志派部队保护我，杨司令立即下令派了一个班对我监护。每次批斗时，均有两个战士陪同，站的时间长了，战士拿个凳子让我坐着听。由于总理有了明确的指示，杨司令等军区领导坚决执行，在战士的具体保护下，武斗被制止了。此后，在济南重点大企业、大专院校及省级召开的各系统批斗会上，没有再发生武斗。”

与档案材料相对照，谭启龙的“回忆”很大程度上是失实的。

一、谭启龙这封信，是写给中办的工作人员孙吉太，请孙转告汪东兴，而并非是想通过中办直接转交给周恩来。以谭当时的处境，没有直接向周转告的奢望。

二、这封信是谭启龙本人的亲笔信，并不是他儿子代写的。

三、康生对这封信作了具体的批示，要求杨、王查清情况，“严加禁止”。谭启龙在其回忆中半句也没有提及，可能是并不清楚这一过程，亦有可能是有意回避了康生对其处境的过问。

四、谭启龙不提康生，而将其处境得以改善归功于只对其来信简单批一句话的周恩来，从批示上看，周恩来不过是要杨得志、王效禹看一看这封信而已，下一步如何，周并没有表态。而所谓周恩来打电话责问王效禹，“具体指示杨得志派部队保护我”等等，不知谭是如何得知的？

## 二、关于彭真的批示

彭真(1902-1997), 1966年5月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4月16日, 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讨论彭真的错误。5月4日-16日, 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人的错误问题。会议决定, 停止彭、陆、罗、杨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职务; 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并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 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彭真自此失去自由, 前后长达十二年。

1968年7月9日, 中央专案第一办公室所属的彭真、刘仁专案组, 向负责中央专案审查工作的康生、谢富治、黄永胜及叶群作出《关于逮捕大叛徒、大特务彭真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称:

“大叛徒、大特务彭真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迄今, 一直由北京卫戍区负责监护(康生加: 对审讯、监视、防止泄密, 很不便利。)现在根据查证, 彭真不仅是一个大叛徒, 而且是隐藏在我党内部罪恶累累的大特务。在监护期间他的反革命气焰一直非常嚣张, 拒不交代问题。同时为了彻底查清彭真的内奸罪恶活动, 建议将彭真立即逮捕, 送交秦城监狱关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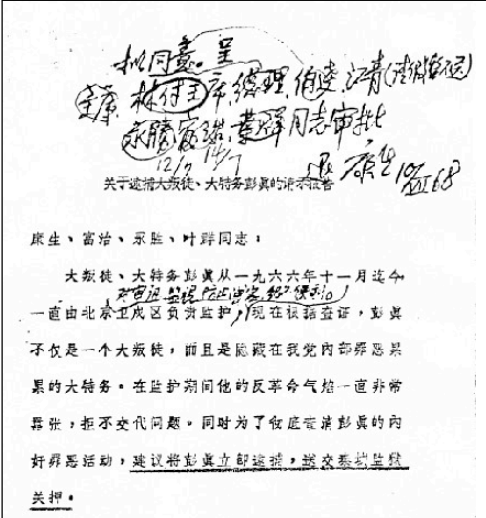
“一、一九二九年, 彭真在天津被国民党一经逮捕就跪倒在敌人脚下, 出卖组织和同志, 成为可耻的叛徒, 现在根据大量事实又证明, 这个家伙还是暗藏在我党内部的大特务。彭真在北平狱中, 曾接受国民党反动派任务, 答应‘为国民党工作’。一九三五年出狱后, 在大叛徒、大特务刘少奇的旨意下, 经过日、蒋特务李铁夫、张秀岩的介绍, 到北平住在汉奸、特务机构‘大义社’内, 和大汉奸张璧、宋哲元, 张自忠、潘毓桂等秘密勾结, 进行了一系列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活动。抗日战争初期, 彭贼和中统特务胡仁奎串通, 在晋察冀各地, 设立国民党部, 建立特务组织, 向国民党反动派发送大量情报, 破坏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 他在东北和林枫、吕正操搞‘桃园三结义’, 结成反革命联盟, 猖狂反对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 并阴谋搞军事叛变公开投靠蒋匪。解放后, 彭真伙同罗瑞卿、刘仁、冯基平等, 盗窃大量国家核心机密, 送给敌特机关。尤其是

一九五七年，公然派遣潜伏匪特，去台湾参加蒋匪的‘八全’大会，向其献计献策，效忠其主子蒋介石，攻击、破坏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二、彭真贼心不死，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一直怀着刻骨的仇恨，对他的种种罪行，至今不但拒不交代，还借机大肆放毒。在历次审讯中，他气焰嚣张，在事实面前百般狡辩抵赖，甚至进行疯狂反扑。大叛徒、大特务彭真罪大恶极，应该逮捕关押对他采取专政措施，同时为了彻底查清他的内奸罪恶活动，也利今后对他的斗争。”

为什么彭真由卫戍区监护上升至逮捕关押，送至秦城监狱？上述报告缺乏有逻辑性的理据。不过话说回来，在那个年代，并不需要什么理据不理据，关键在于彭真是毛泽东钦点的，文革伊始即被打倒的“重犯”。毛泽东在 1966 年 4 月就说过：“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情，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

一步一步深入，彭真就从“反党集团”的头子，令人匪夷所思地深挖成“不仅是一个大叛徒，而且是隐藏在我党内部罪恶累累的大特务”！



彭真、刘仁专案组的活动，是为中央政治服务的。对于这个小组所报告的重大问题，康生一个人并没有决定权。故而，康生在这个报告上批示：“拟同意。呈主席、林付（副）主席、总理、伯达、江青（请假暂不送）、永胜、富治、叶群同志审批。”我们可以看到，毛、林、周、陈、黄、谢、叶都

划了圈，周恩来、陈伯达还特地将自己的名字引至“同意”两字处。

仅就《关于逮捕大叛徒、大特务彭真的请示报告》而言，如果“同意”就是诬陷和迫害，就负有罪责，那不仅是康生，以及“坏人”林彪、陈伯达、黄永胜、谢富治和叶群，“好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同样逃不掉“罪责”。

### 三、关于吴德峰的批示

吴德峰(1896-1976)，中共党内曾长期从事秘密情报、交通工作的老人。1924年即加入中共，1928年至192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交通科科长。1931年起历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国家政治保卫局江西省分局局长，湘赣军区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兼红六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长征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白军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外交部对外联络局局长。西安事变后随周恩来到西安，参加领导秘密情报工作，后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建国后，历任武汉市市长，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政法办公室副主任。文革前，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文革中，受到冲击。

1969年3月4日，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对外身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为吴德峰事给康生、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据外调人员反映，吴德峰同志年老有病，身体很不好，现仍被高等法院群众专政，因两派争议，问题不能解决。”

“据了解，德峰同志在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长征途中，他任当时中央局的白区工作部长，是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康生批注：在1931年前后，当王明等篡党时，他是坚决反对王明的。）双十二后在负责西安秘密情报工作中，是忠于毛主席的，反对王明、博古的，在总理、康老领导下，他对敌斗争是勇敢和机智的，对党是有很大贡献的，有关文电档案，现均存我部可查。”

“德峰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和其他部门工作中的情况我不了解，如果历史上没有查出重大问题，希望中央能通过高法院军代表向群众组织作些工作，对他作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对他生活上作可能的照顾，帮助他向群众作认真的检查，争取群众的谅解。妥否，请予考虑。”

当天，康生收到这封信，即作如下批示转给周恩来：

“吴德峰同志在思想作风上有许多毛病甚至有许多错误，解放后他的工作不了解，表面上看是官气十足。但他在上海和西安的白区秘密工作中，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忠于党的，我觉得对他应是一批二保。是否可请富治同志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帮助他认真检查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解除群众对他的专政。据说他病的很利害（**厉害——编者**），应给以适当照顾。”

周恩来当天也作了批示：“同意康老、罗青长同志意见，请富治同志办理，仍以一批、二保为妥。”



第二天，主管政法、公安工作的谢富治也作了批示：“完全同意康老和总理的批示，对吴德峰同志应该是一批二保，军代表和×××同志（余注：原件字迹不清）应向群众做工作。”

康生曾经担任中共中央调查部的前身——中央社会部的部长，对建国前吴德峰的工作，应有一定的了解。故而，康生对吴德峰的批示，无疑比周恩来的具体、详细，“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忠于党的，我觉得对他应是一批二保”，有这么一句话，也足够了。

从康生的批示中，是可以感受到他对吴德峰的同志之情的。这无论如何也不像一个“迫害狂”所说的话。康生类似这样的保护性的批示，还有多少？在康生文革中所有的批示里，类似的批示，占了多大的比例？这是我们甚感兴趣的课题，因为，弄清了这一问题，也就会使我们向了解一个真正的康生的目标，前进一大步。

2011年1月

---

### 【争鸣】

按：此文是陆小宝对沈昆的回应（沈文载《记忆》总59期）。近来，在清华大学校友关于本校文革史的争论中，有一些针锋相对的观点，陆、沈二人可为代表。本刊无意介入个中的两派之争，选发陆文，只是希望能对深入展开对文革历史的反思起到一些推动作用。

## 怎样理解“剥洋葱”

### ——与沈昆同学商榷

陆小宝

我在给《倒下的英才》一书所写再版后记《流着眼泪剥洋葱》中说：“如果有一位文革研究专家，追踪此书（《倒下的英才》）从初版到再版的过程中发生的

种种事态，把所有相关辩论文章搜集成册发行，这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它可以让人们看到，这些参加清华百日武斗的知识分子精英，过了四十年后，他们的思想有了哪些进展。对唐金鹤在书中揭露出来的血腥暴行，他们敢于直面承认吗？他们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见《记忆》总 59 期）沈昆的《陆小宝校友“剥洋葱”的误区》一文正好提供了这样的代表文本。

我相信广大读者的辨别能力，本来不想多说。但是，其中牵及到对钧特·葛拉斯和李敦白两位外国名人的理解问题，有必要稍作解释。而且我认为，理解这两位外国精英，对今天我们认识中国部分精英在文革中和文革后忽而极左忽而极右的现象，很有帮助。

### “剥洋葱”不是文革中的“剥画皮”

我在《流着眼泪剥洋葱》一文中提到了钧特·葛拉斯，并说“对德国精英的这种‘病态’的道德良知和道德勇气，我们中国的精英，我的清华大学同学们，是否也该有所感悟呢？”不想竟让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受到牵累。一时间，某个清华校友网站上，充满了对钧特·葛拉斯的揶揄轻慢之词，什么“矫情”呀，什么“流着眼泪剥洋葱，蘸着鼻涕吃土豆”呀，都出来了。沈昆大概是文革时“剥开谁谁的画皮”之类的文章写多了，一看到“剥洋葱”，马上想起“要剥谁的洋葱”，进而认定“陆小宝只剥半个洋葱”。

其实，我在拙文开头就介绍，钧特·葛拉斯的“剥洋葱”，主要不是要揭露自己干了多少坏事（当时他 17 岁，未发一枪，受伤被俘，并“没动手干坏事”），而是正视自己应该承担的“共同负责的东西”。因此，拙文也是秉承钧特·葛拉斯的思路，提出主要从文化的角度反思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我明明说了“在第三层次，即文化的层次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都需要反省”。这里的“每个人”，当然包括我陆小宝自己。揭露文革中的暴行，无论是团派的暴行，还是 414 派的暴行，是我们每个清华文革亲历者的共同责任。我相信，叶志江和陈育延的回忆是真实的，我从来都是同情他们，支持他们的。据我了解，唐金鹤书中揭露的种种暴行也是真实的，我也支持她。对唐金鹤书中没有提到的 414 方的暴行，我尽量提供线索，加以补充。比如，也许沈昆不知道，414 有人在科学馆打何东昌耳

光这一事实，就是我亲手调查，核实以后，特意建议唐金鹤加上去的。看看我所有的文章，哪篇哪段哪行哪句我写过，“要剥团派的洋葱”？查查我的讲话，哪年哪月哪天哪次有谁听到我说过，“团派坏人多”？沈昆如此指名道姓地批判别人，起码应该认真读一下别人的文章，理清别人的思路，怎么能将自己的思想转嫁到别人头上，再振振有词地批判起来呢？

沈昆批判道，“414 相当一部分人对团派同学的阶级歧视心态，甚至连已经定居美国多年的陆小宝至今对这种阶级歧视仍持‘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见陆小宝为唐金鹤《倒下的英才》所写的序）”。

对这一莫名其妙的指责，我终于找到了出处，原来在沈昆《反思清华百日武斗——兼评〈复原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一文中，他就错误地编排我说：“陆小宝例举赵德胜的命案作为所谓的阶级报复案例，仅只是因为赵的父亲或什么亲属被共产党镇压了。陆小宝在美国居住多年，总应该懂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除非有证据，不能因人的出身不同而加重定罪。要给赵德胜确定阶级报复的罪名，就需要赵德胜专门针对贫下中农、工人阶级、或党员等特定人群犯罪的证据，就需要赵德胜开枪前就预先知道受害者是无产阶级出身或是党员等的证据。存在这些证据吗？赵的提前释放，就说明法院都认识到当年的判决有错，而陆小宝校友至今还津津乐道，拿着多年以前的错误当宝贝，是否也太过落伍了吧？”我这才发现，原来，他的所谓根据，居然就是他自己编排的这段话。

但是，白纸黑字写得明白，所谓“陆小宝例举赵德胜的命案作为所谓的阶级报复案例”中，“赵德胜阶级报复杀人”的这个概念，是叶志江提出来的。（在我有限能查到的文字中，确实只看到过叶志江是这样说的。）我不过是列举介绍叶志江的观点，摘录了叶志江写的一段文字而已。摘录的文字有引号，提供了叶志江文章的名称，有地方可供查证。而且，前面我还特地加了一句“他们甚至将某些武斗打死人的现象说成是坏人进行阶级报复，”明确表示了我对这种观点的保留态度。紧接着，我说：“我还想补充一点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认为，团派在武斗中过失较多，其主要原因不在群众，而在头头。同学中分派站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两派群众的人品和能力，基本一样，至少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我说得如此清楚，在“我认为”后面才是我陆小宝的观点。

再说，无论在团派还是 414 派中，对赵德胜这样枪杀同学的血腥暴行，只要

有一点正义感的人，谁都痛恨异常。在清华同学当中，叶志江一向以思想敏捷受到大家的一致推崇。他对赵德胜的行为产生这样的联想，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如果沈昆对叶志江的观点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去同叶志江讨论。沈昆不可能不知道，叶志江是团派的。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把这样一个可以互相切磋讨论的问题，有意地注入派性，反说“414相当一部分人对团派同学的阶级歧视心态”呢？

### 李敦白和沈昆的文革观的差别在哪里

沈昆在他的文章中多次提到李敦白，还加了“据李敦白对我说”之类的话，好像他对李敦白十分了解。他说，“我想，我们当中很多积极参与了文革的同学，大概都有类似李敦白从延安到文革那段时间的心路历程——艰难而曲折但追求思想自由的初衷难改。”

李敦白是个美国人，有着传奇般的经历，曾经接近中国政治高层，又是文革名人。在中国文革中的经历，他自己有专门的著作；近年来，各种媒体对他的经历和政治观点也多有报道。了解李敦白对文革的观点并不难，也确实很有意义。

沈昆把李敦白引为同道，但是我认为，李敦白对文革的认识同沈昆有着很大的差别。

差距在哪里呢？我想大致可以列出下面三条：

**首先，在意识形态上，是信仰和探索，还是跟风赶潮流。**

沈昆的文章告诉我们，他是跟风赶潮流的。我不怀疑，沈昆在文革中和文革后，确实有着“艰难而曲折但追求思想自由”的“心路历程”。但这只能说，他在追求个人的思想自由；还不能说，他具有某种信仰。沈昆一直在跟风赶潮流，在他的文章中，更进一步，干脆把这种风和潮流当成了一种判断是非的标准。他说：“文革中体现的顺应时代潮流，利于社会进步，于人民群众有益的种种诉求，则往往只能以粗浅幼稚的形式显现，有时甚至不免荒唐。”他又说，“几十年来，我们缺乏对文革正确的反思，对许多已知的事实也仍然存在尖锐对立的看法，就是明证。若要正确地反思文革，无论是制度层面的反思，还是文化层面的反思，前提都必须以世界潮流为背景，认清文革中各种诉求的正误之分，才会对文革做

出比较正确的反思。如何分辨文革中各种诉求的正误？方法之一是把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分别与世界潮流相对照，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诉求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

文革中，什么是潮流？中央文革是潮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潮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潮流，批判邓小平是潮流，极左是潮流。只要看看大字报汇编和井冈山报，白纸黑字俱在，都是在极力迎合和推助这个潮流。文革后，什么是潮流？改革开放是潮流，走资本主义是潮流，骂社会主义是潮流，拥护邓小平是潮流，极右是潮流。有些当年的极左派，眨眼功夫，似乎又成了这个潮流的铁杆主力。

李敦白就不同了。他是一个有信仰，而且坚持探求的人。如果真的像沈昆所说那样，为了“个人的思想自由”的话，他只要留在美国就行了，根本用不着到中国来。在香港凤凰卫视《鲁豫有约》专访节目中，李敦白向观众讲述了他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普通驻华士兵，看到旧中国的遍地饿殍，看到美军汽车压死中国女孩只赔 14 美元，他决心留在中国，帮助中国人民。由此，他接近共产党，到了延安。在参加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李敦白受了不少冲击和磨难。比如，沈昆文中所提到李敦白在延安躲飞机的事，还有因受斯特朗一案入狱受审查的事，在电视采访中，李敦白自己都谈到了。但同沈昆的想象不同，李敦白对自己当时的选择至今没有后悔，也没有因此而怨恨什么人。躲飞机的事，他还是把它作为自己刚参加革命时的思想差距提出来的。对入狱受审查一事，他是这样说的：到中国参加革命，是我自己要来的，而对方要不要我，还有他们的条件，在还不知道我是否可靠之前，当然要进行审查。（大意）在镜头面前，他说的是这样的纯真，这样的深情，感动了电视机前大批观众。

斯大林死后，李敦白出狱，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向他道歉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错了”，并问他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满足他，也可以让他出国。李敦白表示，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回原单位工作。文革中，李敦白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主动要求减少自己这些外国专家的工资，也搞批判夺权，影响很大。不久再次入狱，一关十年，文革结束后才出狱。面对文革的沉痛教训，李敦白进行反思，认识到自己过去的理想有许多虚幻的东西，革命党中有许多残暴的东西，革命领袖也有许多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东西。

但是，李敦白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没有变。回美国后，他成立了一个中国问题

咨询公司，尽力继续为中国人民作一些事。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信仰，像许多老革命那样作“觉今是而昨非”状。在电视节目中，主持人要他用一个字来概括自己的一生，他想了半天后说：学。也就是说，他没有跟风赶潮流，他还在进行追求和探索。

不久前，在接受《共识网》专访时，他说“原来我设想的那种共产主义，马列主义，苏联的那种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我认为是失败了，不然共产主义的道路不会是那样的道路，我认为。是什么样的道路，我觉得我们还在摸索，还要摸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今年四月，在美国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对着众多中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敦白尖锐地指出，“别以我们美国人自己的思维来看待中国，教中国人怎么做。”在与记者交谈中，李敦白又说：“我们美国人很容易从自己的角度来设想中国人应该要求什么样的民主自由，但与中国人的实际要求可能相差很远，可能人家最急迫想要的并非我们想象的，而是适合他们现实的情况。”

他还说，“中国将会实现民主，不过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和时间。共产党在1949年后没有能兑现自己的诺言——给予农民土地，民主，公平，这些都是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就包含的东西。”

## **第二，对历史和现实，是中肯的分析和总结，还是极端的肯定和否定。**

沈昆的文章告诉我们，他是倾向于极端的肯定和否定的。文革期间，清华两派中的有些人赶极左社会主义的潮流，在彻底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极端地认为：清华大学已经完全被修正主义占领，所以要彻底砸烂，这就是他们“彻底否定十七年”和所谓“大翻个”的理论。为了追求极端的社会主义，他们不惜采取极端残暴的手段，无情地批斗、殴打老师和同学，制造了一件件触目惊心的文革惨案。文革后，这些人又忙着赶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潮流，一反文革时做出对党内当权派变质腐败现象坚决斗争的姿态，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一概采取包容和肯定的态度。这里有个例子：四川汶川地震后，部分清华校友在清华网上，对某些当权派在校舍建筑中偷工减料的腐败现象表示义愤，这些人却对这种义愤大加鞭鞑，不惜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大帽子，进行批判。两年前的清华校友网上引起这场小小的震荡，我相信不少的清华校友至今记忆犹新。

与这样的态度相反，李敦白对文革前和文革后的中国社会，不是简单地一概肯定和一概否定，而是采取中肯的分析态度，有啥说啥，所以，比较接近真实。去年国庆六十周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记者要求李敦白对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以后时代的中国社会作一个对比。李敦白是这样说的：“毛泽东年代的中国是根本不一样的，很多现在的社会公害那时候却没有，那时候没有毒品，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偷盗，也没有贪官污吏，或是说极少，也没有卖淫，没有赌博，人和人之间都比较的亲密，但同时有阶级斗争，不少人被陷害，特别是知识分子，受的压力非常大，所以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现在那种压力就减轻多了，知识分子不太觉得自己受威胁，没有人要改造他思想。但同时那些社会公害都挺猖狂的，我觉得这个对比是比较复杂的。”

在另外一次采访中，李敦白还提出一种看法：是毛泽东时代给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和国际环境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李敦白不赞成那种将中国历史截然分成正确和错误的两半，非此即彼的看法。他肯定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和五六十年代时的一些成绩，也为当时极左政策造成的巨大伤害深感痛心；他为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感到高兴，也为目前中国的两级分化和道德危机深感忧虑。他认为，目前中国“在长征 70 年后处在十字路口，一个生死的关头”，“首要的问题是缺乏被传授的道德和精神价值。”他深情而又痛切地说，“我要问一下中国，经济强大了，却失掉了灵魂，有什么意义呢？”

**第三，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是反省和忏悔，还是固执己见，认为自己一贯正确。**

从沈昆写的文章看，他是认为自己一贯正确的。明显的事实是，清华文革的两派，都犯了不少极左的错误，都有过一些血腥的暴力行为。时至今日，我原本以为，至少在谴责血腥暴行和反极左问题上，双方总该有共同认识。所以，我在拙文中提出，“双方同学对自己的派别理应进行两重剥离：首先，将政治观点同血腥暴行剥离；其次，将政治观点中的极左成分同合理诉求剥离。”谁料想，沈昆完全拒绝这样的剥离。沈昆对自己一派在文革中那些灭绝人性的暴行百般掩饰。甚至，连本派头头蒯大富反思武斗的责任，他都表示反对。他一再强调，清华武斗中 414 方也有许多暴行，团方的一些暴行被对方夸大，似乎这样一来，唐金鹤的书中所揭露的血腥暴行就都不存在，或者毫无意义了。他的思维逻辑很奇

怪，他再三指责“毒箭杀人”说，和“消防车喷油放火”说，但有意回避向读者交代一下：卞雨林被杀了没有？东区浴室被烧了没有？再说了，实际上，唐金鹤的书并没有采取这两种说法，沈昆却还是有意拿这两说来反对唐金鹤的揭露事实。在沈昆看来，是不是不用“毒箭”和“消防车喷油”的杀人放火，就不许别人揭露，也用不着自我反思了呢？

李敦白怎么样呢？他在文革中有一阵确实跳得很高，有些跟风投机的行为，也发疯做过一些不得人心的事，但他没有参加过武斗，也没有杀过人放过火，很快就被抓入狱，到文革结束后才被放出来。而且，文革后，有关部门专门给他平反，明确表示，当时对他的处理是错误的。按理说，他用不着太自责了吧。但是，从他自己的文章和记者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他“自从离开中国后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灵魂”。他“承认犯下的错误、幼稚和盲目——尤其是支持 1965 年到 1975 年疯狂和恐怖的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他说，那是一个“疯狂的意识形态”时期，人们“心肠冷酷，在做好事的名义下消除了所有人类感情。”

回忆起文革时的孟浪，他说“在那些如醉如痴好似被催眠的日子里，我们都做了一些奇怪、有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他沉痛地追悔，当时自己伤害了不少老干部和老上级。“日后我常想，我们怎么会那么得意忘形？”在谈到文革中两派分裂时，他说：“我们不知道民主更要小心翼翼的保护少数派说话的权利，没有对立面自己就要疯狂，迟早要走向完蛋。”

我个人认为，对当时的李敦白来说，“得意忘形”四个字，可谓十分确切，看来李敦白的反思真是触及了自己的灵魂。难怪一位网友看了李敦白的文章后写道：“我看过了一些中国人写的有关‘文革’回忆文章，发觉这些回忆文章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写当事人自己在‘文革’中如何受到冲击和迫害的，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无情陷害和残酷打击，而极少谈到自己在‘文革’中所做的那些错事，极少反思自己在运动中对于别人乃至对朋友、领导和同事的某些伤害。在回忆和记述方面，远远没有美国人李敦白那样的坦率和真实，也更缺少敢于承担错误的勇气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我以为，这绝不仅仅反映了中西方人们的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且也有历史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对于个人在历史过程中作用与责任问题等方面的种种差异。这种种差异和不同，难道不值得我们一些人深刻反思吗？！”

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李敦白和沈昆对文革的看法，确实存在着



很大的不同。我从来没有李敦白这样复杂的经历，也不很赞同他的信仰和政治主张。他写过一本书《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同目前他的有些思想，似乎也有着比较大的反差。但是，从他最近的一些讲话看，他还在思考，还在探索。我认为，李敦白的这种认真求索的态度，对我们今天反思文革，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

## 中国精英的阵发型风•疯综合症

同李敦白比起来，实际上，在文革中我与沈昆倒是有着更为相同的经历，虽然参加不同的派别，但是，“追求思想自由的心路历程”，也可以说是相同的吧。而且，文革中，我们都犯过同样的错误，文革后，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基本相同。沈昆文章中的某些观点，比如，文革对我们这些人的思想解放作用，以及对开启改革新路的意义，等等，我也是赞成的。我在《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一文中就说过，“从某种角度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正是这种思想解放运动，促成了中国历史的转折。”在《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一文中，我说，“如果问，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成果？可以说，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解构，这才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成果。这个成果是发动这场运动的人所始料不及的，但正是它，一直在制导着中国过去几十年、现在和将来的发展走向。”

那么，我们同沈昆的认识有没有不同的地方呢？当然还是有的。为了说明这种不同之处，我想提一下汲鹏的一篇文章：《文革使中国这个巨人改变了方向》。在文章中，他说，“中国这个巨人站起来后，偏执地朝着一个方向走。美国不能让它改变方向，苏联不能让它改变方向，三年困难时期不能让它改变方向。文化大革命中举国欲狂，大家疯狂了一阵，朝着这个方向走到了极端，让全党全民都看到了偏激地向一个方向走的危险性，终于让这个巨人改变了方向。也许同发动者的初衷相反，文化革命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紧接着，汲鹏说，“我作为一个文革的亲历者，想起文革中所做的事，有时真是羞愧难当，”“文革的历史，完全印证了‘物极必反’这四个字。文革时我们经常批评对方说：上帝叫他灭亡，先要叫他疯狂。任何时候，任何事情，只要走上极端，就肯定疯狂；一旦

走上疯狂，离死亡就不远了。这个道理，今天我们真该好好总结总结。”

很明显，汲鹏认为，文革使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是极端和疯狂的结果。但要记住，这个结果，是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磨难后才得来的。在这些遭受的磨难中，包括了我们这些文革亲历者自己的磨难，甚至包括了我们许多同学、老师和朋友的血和生命。这个代价非常之大。无可否认，这些磨难中的某些部分，是由我们这些文革亲历者自己的极端和疯狂的行为造成的。文革导致改革开放的结果需要珍惜，文革经受过的磨难也要牢记。极端和疯狂是危险的和邪恶的，需要我们好好总结教训，告诉后人不要再犯。

同时，汲鹏的文章还暗含着一层更深的意义，而这层意义常常被人们所忽视。诚如汲鹏所言，文革时，疯狂向一个方向走到了极端，大家看到了危险性，使中国转向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样原因的转向，是中国的幸运，但也极可能潜在着两个弊端：第一，很容易凭借某个方向在非常时期和疯狂时期的表现，来匆忙地评估这个方向的全部价值，从而得出应该彻底否定它的结论。第二，很容易为了避开某个方向走到了极端而带来的危险性，从而急切转弯，选择另一个相反的方向狂奔，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文革后，全国人民都向往着改变，改革开放是得人心的。但是，在某些利益集团和知识精英的导引下，又出现了许多极端的思想和极端的做法，陷入了新的“凡是”和新的“僵化”，存积了越来越多新的社会矛盾，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和忧虑。应该说，每种意识形态都有它们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也有它们自己的适应条件和适应范围。在一定的条件下，选择某一种方向，不一定会错；融合两方的优缺点，尝试一个新方向，也不一定会错。但是，不管是何种方向，只要疯狂地走到极端，则毫无疑问，一定是错误的，疯狂的结果必定是邪恶的。我在《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一文中说过，意识形态的极端取向，是文革的思想基础。今天的中国，两派精英的意识形态斗争大有烽火再起之势，我想，我们应该牢记文革的惨重教训，时刻警惕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造成新的社会灾害。

李敦白是一个美国人，是为数不多的，参加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外国精英，分析他最近反思文革的思想历程，具有特殊的意义。我认为，李敦白最近的文革观和沈昆有三点差别，而从这三点差别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革某些精英的思维范式有一个共同的毛病。这个毛病，文革前许多精英就有；文革中有，清华团

派有，414派也有；文革后，不少精英还是有。我将这个毛病称为“中国精英的阵发型风•疯综合症”。

我之所以将其作这样的命名，因为它是中国精英所特有的，它有三个症状：一是“风”，中风，是看风向，赶潮流而中的风。二是“疯”，发疯，走极端，说假话、干绝事所发的疯。三是“阵发性”，发病不觉有病，不反思，不忏悔，这次发了后，下次还再发，只是一会儿跳到极左，一会儿跳到极右罢了。

风•疯综合症的“中风”和“发疯”，经常是一起发作的。跟风赶潮流，往往是人们对执政当局昏乱指示的无奈之举，有些人跟风赶潮流，就能跟出水平来，他们常常能够变消极为积极，把执政当局昏乱指示极端化，理论化，为王前驱，自己发疯，也导引整个社会发疯。跟风，本来是平庸的，这种人一极端就能脱颖而出，猛然高深起来，有资格当精英了；跟风，本来是麻木的，这种人一极端，发起疯来，破坏性极大，这就是邪恶的了。风•疯综合症，就是这样既平庸又高深，在平庸中冒充高深；既麻木又邪恶，在麻木中散发邪恶；既误国又伤民，在误国中最后一定也会伤害到他们自己。

风•疯综合症是个痼疾，过几年就会阵发一次。因为是赶潮流，永远站在“正确”的一边，因为是走极端，永远站在强势的一边，所以总是能抢到话语权，感觉自己永远正确。丁玲就曾经说过，开始批她右，后来又批她左的，是相同的那几个人。

风•疯综合症的危害性极大。文革中，我们清华学生犯的就是这种既跟风又发疯的毛病。文革两派，每派都有跟风的理论家，每派都有疯狂的打手。最后，像我在《倒下的英才》书评中所说的那样，有些清华英才成了“丧失人性的英才，杀人放火的英才，中了邪的英才”。尤其是，到处煽风点火，搅得天下大乱，造成的危害就更大了。可以这样说，当时如果只有一个独裁的领袖和几个弄臣，而没有我们这些患了风•疯综合症的精英们在推波助澜的话，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恐怕是不致于会弄到这种地步的。这是一个多么惨重的教训哪！看看同我们一起参加过文革的李敦白吧，虽然同我们一样也跟过风，发过疯，现在人家已经有所觉醒了，我们呢？！

最近，有清华同学提了“走出文革”的口号，这个口号很好。但是，我想，“走出文革”不仅是要走出文革的派性，走出文革的恩怨，更重要的是要走出文

革的思维范式，也就是走出“赶潮流，走极端”的思维范式。积极防治，进而根治这种误国伤民，害人害己的风·疯综合症，这才是真正的走出文革。

---

## 【简讯】

### 《邱会作回忆录》、

### 《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 分别在香港出版

梁志福



《邱会作回忆录》（上、下册）于春节前在香港由新世纪出版社出版。春节后，又有《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上、下册）在香港由北星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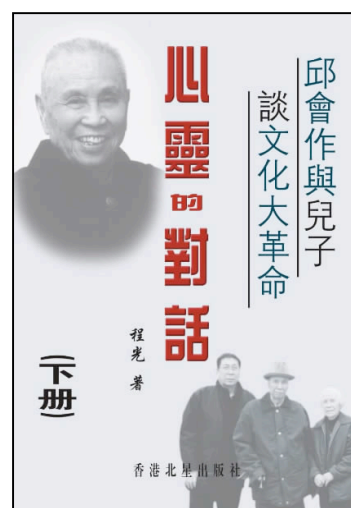
邱会作（1914-2002），江西省兴国县人。1955 年被授予解放军中将军衔；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被隔离审查，后被定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81 年 1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其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 16 年。1987 年刑满。2002 年 7 月 18 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 89 岁。

《邱会作回忆录》共 1028 页，配有照片 98 幅。由田园书屋经销。此书回忆了作者参加红军以后所经历的战争年代、建国后的军队工作、文革中的遭遇及“九一三”事件后被长期关押审查直至判刑、服刑等经历。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有关文革遭遇及“九一三”事件直至“两案审判”前后的一些章节（从第二十一章“军队文革的序幕”到第四十章“在秦城的日子”等）。书中披露的大量鲜为人知的高层内幕，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新的重要史料。此书是由邱会作长子邱路光提供的版本。路光是北京工业学院航空工程系六七级学生，文革中与女同学克非（原煤炭部长张霖之的女儿）的恋爱婚姻曾惊动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

方要员，因张霖之是被毛泽东第一个点名钦定的“走资派”，在文革批斗中被造反派打死，张的女儿自然就成了“黑帮”后代。江青得知邱会作儿子和张霖之女儿的恋爱后，指责邱会作“一点原则也不讲”。周恩来得知后，则建议邱会作将此事报告叶群，得知叶群十分支持，周恩来即批示同意路光与克非结婚。婚后，叶群特地安排林彪在家接见了这对新人，林彪称克非为“好孩子”，并说：“张霖之是好同志，他为什么被打死了？他被打死都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路光在“九一三”之后也遭遇株连，被关押、劳改、审查近八年，解除审查后，1981年转业时又被无理降了三级，还是赵紫阳总书记在路光的申诉信上作了批示，才恢复了他的原行政级别并分配了住房。

《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作者是邱会作次子程光（邱承光）。程光 1965 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8 年参军。在“九一三”事件后与母亲、兄妹等一起受到株连，曾两次被关押，1979 年被取消党籍离开军队，后上书胡耀邦，经胡耀邦批示过问，得以恢复党籍取消处分并安排到江苏无锡工作。（封面右下方照片为程光与父母合影。）1998 年，为了协助寓居西安的父亲整理回忆录资料并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他辞掉了大型中美合资企业高管职务，陪同暮年的父亲反复回忆、探讨过去那些重要历史，父子间有过许多对话。此书所记录的对话，既有当事人亲历的史实和第一手资料，也有事后的分析、反思和感受，从此书可以了解到文革中若干重大事件鲜为人知的真相、背景和幕后故事，可以看到那些活跃于彼时的历史人物的生动面貌，还可以听到当事者在痛定思痛后清醒的肺腑之言。

这两本书的出版，为文革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值得人们关注。



## 【文摘】

### 回味“九一三”

程 光

按：本篇摘自程光著《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一书。文中的父即父亲邱会作，子即儿子程光（邱承光）。

父：1972年5月初向我宣布了审查意见以后，到76年年底，近五年时间里无人问津，我只能苦闷地消磨日子，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子：那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几年。毛泽东继续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一浪一浪接连而来，上至国家总理周恩来，下至普通平民百姓，无数的人被卷进政治漩涡，遭到批判和整肃。

父：紧张的提审突然停下来，开始我还不适应，脑子里想的东西特别多，时间一久，就理出头绪了。当然，我反复思索的还是“九一三事件”。

子：“九一三”很复杂，你主要考虑些什么？

父：林彪是否有谋害毛主席和阴谋武装政变是“九一三”的核心。

子：这两件事被官方说成是“两谋”。

父：我考虑了很多，现在也还时常想，“两谋”令人难以置信呀！我提出的证据和理由很多：

第一，林彪没有政变夺权的理由。1958年林彪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排在总书记邓小平前，是最年轻的领袖、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1966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成了唯一的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合法、程序化地继承政权是林彪最期盼、最有利的。毛主席年近八十岁，身体不好，亲自视事最多不过几年，外人对此不知，林彪完全了解，他有必要那么急不可待吗？

第二，林彪想控制局势不必政变。1971年8月中旬毛主席南巡了，北京是“真空”。林彪想干什么，没必要武装政变，堂堂正正地指挥就是了。

子：还有周恩来总理在北京。

父：对这个我就不予评论了。什么张春桥、姚文元呀，用几个警卫员就够了。当然，林彪若这样做也不是一点风险都没有，但总比武装政变的风险小多了。

第三，林彪没有非分之举。林彪在军队威信很高，抽象地说，毛主席威信更高，但林彪毕竟和军队近得多，不是说“解放军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吗？他真要搞军事政变，为什么不“直接指挥”？为什么不动用军委办事组，不动用军区司令员呢？至少也要动用一军长或师长吧！可是都没有啊！

林彪信任军委办事组，为什么在自己生死存亡之际又不动用？

指挥解放军有程序，只要一动，我们就会知道，可是没见到林彪一点动静。

子：指挥军队的程序，难道绕不过去吗？

父：绝对不可逾越。细节就不说了，那是国家机密。要政变，不找军委办事组“办事”根本不可能！把 1969 年军委下达的预防苏军突袭的战备“一号令”说成是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预演”。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政变是隐蔽性、突发性极强的行动。古今中外，从来没有政变前还要“预演”一下，事先打“广告”的。连这种事也列作林彪政变的主要证据，岂不成了笑话。

第四，林彪是沉稳、从不轻举妄动的人。林彪一生带兵，深知军事手段的厉害。政变是特殊的军事战斗，这个利害关系，他能不知道？武装政变要有计划、部署、部队、指挥官。这些都没有，怎么政变？我根本不知道有武装政变，林彪没有通知我，也没有任何人通知我做好行动的后勤保障和武器准备。黄永胜也没有通知任何部队做准备。政变不是一两个人可以搞得了的呀！手里没有部队，没有周密的组织指挥，搞什么政变？那不是胡扯？林彪会放着军委办事组不用，反而让林立果找来几个毫无军事指挥常识的空军机关政工人员和秘书去搞政变，那不是胡闹吗？林彪是个打仗、办事无十分把握不行动的人，他能不顾一切地做出如此荒唐之举吗？

第五，没有任何政变的迹象。9 月 12 日是“政变”关键的日子吧？那是个星期天，黄、吴、李和我被说成政变的关键人物，都在家中休息，像是要政变的样子吗？我知道林彪从北戴河走了，是 13 日早上听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除了北戴河林彪那儿发生的事，全国都很平静，没有响过枪，没有部队动，哪里像是发生过了武装政变啊？！如果发生了，总会有或大或小的军事行动吧！可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第六，事后也没有政变流产的骚动。9 月 13 日后十天里，各地的军情公文是呈军委办事组报中央的，我们没有接到任何部队相关的报告，就像没那回事儿一样。9 月 14 日，我们根据中央指示，下令陆军管制空军。全国所有的机场，陆军都住入一个连或营。不是说空军参加武装政变了吗？还说有什么使用轰炸机之类的事！但是他们受到陆军的管制，也是乖乖的！没有任何

反应嘛！

子：中央公布的材料说，林彪是武装政变失败后外逃的，否则为什么跑呢？说他“政变”失败后外逃，似乎是合乎逻辑的推导。

父：我认为这是毛主席不负责任。这么定罪，会害多少人啊！

既然说到这儿，那我就再说第七个不可能有“两谋”的考虑，指责林彪武装政变失败后才“外逃”，不能那样推导。

林彪真要“外逃”，应该早于毛主席回到北京之前，那才合乎逻辑，但相反，他“外逃”恰恰晚于毛主席回到北京十几个钟头。

面对毛主席南巡中咄咄逼人先发制人，林彪可以找到出路。林彪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定要出走？我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毛主席和林彪的分歧是什么？以前说林彪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现在给林彪定的罪名反而说他要搞文化大革命。真若如此，那么毛、林之间就没有根本分歧了，那么说，不就前后自相矛盾了嘛！退一万步讲，即使林彪怕别人抓他什么把柄，也不需要出走，积极的出路是和毛谈一谈，消极的就是一言不发呆在那儿，看毛怎么办。林彪和苏联毫无关系，没有任何联系，可能贸然行动吗？即使他萌发了出走之心，之前下几个命令，使国家乱上一阵，可以起到掩护作用，可是林彪并没有那么做。

第八，也是很重要的理由，至今我没有看到公布任何真凭实据的武装政变证据。从1971年到1981年公审，是十年，到现在，又二十年过去了，都三十年了，我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材料。如果有，那可是打林彪的“原子弹”，对他是致命打击呀！当年中央下发的文件，说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是“反动政治纲领”，是为政变服务的，这也算“证据”？完全不能成立嘛！

以上那些道理，我都能想明白，毛主席、周恩来那么聪明睿智，经历过那么多沧桑世故，对林彪又那么了解，他们就更明白了。

子：你提出八条理由，很有说服力。

我再为你补充一个理由，“九一三”后，林彪、叶群，黄、吴、李、邱身边工作人员被拘留审查的数百人，都表示响应中央号召和林彪划清界线，要深入揭发，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揭出有“政变”的事。那么多人在林彪和你们身边，总会看出蛛丝马迹吧？可是一点也没有。专案组叫黄永胜的警卫



员费四金揭发“九一三”事发前的晚上，黄永胜曾于“九一三”前一天在北京和林立果见过面。

父：是小费呀，他可是和黄永胜寸步不离的警卫参谋，有什么事他最清楚。

子：哪怕是纪登奎亲自审讯“动员”，小费也说没有那回事儿。只要他说“有”，后半生会荣华富贵，否则就要倒霉一生了。可是他坚持说，没有那回事儿！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林彪的警卫处长李文普揭发，林彪上了汽车后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它被作为林彪有预谋地外逃的证据。我听和李文普一起受审查的人说，是他得到中央承诺对其保留军籍和待遇等条件后才那么说的。

父：林彪不知道伊尔库茨克在哪儿？笑话！我们办公地方挂的大幅地图上明确地标志着，那里是苏军远东军事指挥中枢，林彪经常考虑的就是那儿，交待我们防止苏军突袭，关注的就是那儿。林彪会问李文普那个话吗？

再说只有李文普一个人那样“揭发”，李有贴身保卫林彪的责任，可是他“玩忽职守”了。他那么说，有推卸责任的动机……

子：我向法学专家请教，这在法律上被称作“污点证人”。李文普被关押多时之后才说，且与他本人利益相关，又是死无对证的“孤证”，从法理上讲，不应被采信。

说到这儿我想，别人会不会认为你也是利益相关者，才说出以上那些理由？

父：我敢说我就敢负责。我不能说我说的百分之百都正确，可能有说误的，包括以前和你说的“九一三事件”，特别是时间、地点、人名字，可能有记错说错的。如果有，我负责。但是事件大的方面我没说错，专案组翻箱倒柜也找不出来我有意捏造的嘛。

我是实事求是，对事不对人，不偏袒毛主席，也不偏袒林彪，面对历史说话。我对林彪的错误，毫不遮掩，对毛主席的错误，也毫不保留。但我不反对他，不骂他呀！我不反毛泽东！

子：中央指责你们，说在这场毛泽东和林彪的斗争中，你们站在了林一边，违反了毛泽东的意志。

父：那可是冤枉我们了。我不否认我们是拥护林彪的，但我们是根据毛主席对林

彪的重用而拥护他的。我们中央红军出身的干部历来都听毛泽东的！过去，毛泽东相信朱德，和他合伙干，那我们就拥护朱德；以后他把朱德摆在一边，用彭德怀了，我们拥护彭德怀，听他的指挥；后来，毛泽东又不相信彭德怀了，把他打倒，用林彪了，我们听毛主席的，拥护林彪，跟着他干工作。如果毛主席不把林彪当成“接班人”、“亲密战友”，我们又怎么去拥护他呢？我对林彪的拥护同毛主席对他的重用是一致的。再说，我的拥护是有条件的，就是林彪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拥护他。如果他不拥护党中央毛主席了，我也就不拥护他了。

子：如果之前林彪和毛泽东公开反目了，你会站在哪边？

父：我从来没有想过背叛党，背叛毛主席。

子：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为你们定“政变”罪呢？其它罪名也可以把你们打倒嘛。

父：毛主席为我们定这个“罪”，是为了能随心所欲地处理林彪问题。把我们关起来，不是依法处理，而是要用“活人”的口供证实林彪“弥天大罪”的存在，毛主席就好名正言顺地处理林彪事件了。如果我们几个都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了，那林彪不就罪该万死了！毛主席听到林彪的死讯后不是说“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吗？他心里完全明白呀！不为林彪定这个罪，毛主席就没办法推卸自己好多事了，对人民和历史就交待不了嘛！

子：也就是说，这和毛泽东为刘少奇定“叛徒、内奸、工贼”的道理一样，如果不那样为刘定罪名，就不好处理他了。

父：是这个理，但还有更多的内涵，如果不为林彪定这个罪，岂不是说林彪就是被毛主席逼走的，那可不得了啦！还有，毛主席和林彪历史上的关系那么久，那么密切，如何解释？不定这个罪，那就不能自圆其说了嘛！

到了这一步，对“九一三”已经不是要搞清事件本身的真相了，而是各派政治人物都在利用这个“政治素材”做文章。毛主席用它来做“林彪帮一个大忙”的文章，周恩来用它来做“划清界限”的文章，上海帮用它来做“争取成为接班人”的文章，汪东兴他们用它来做“掩饰自己”的文章，还有一些人用它来做“东山再起”的文章……对“九一三”的审理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审查，而是根据政治需要来办的事了，必需有一个“反革命政变”，才能让各方的不同政治需要能够实现。

子：作为政治家，他们那样作，不失为一个应急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

父：林彪死了，无法说话了，我们又被封了口，这种手段在一定时间内是起作用的。但是，假的总是假的，特别是我们这一批人还活着，是懂得内幕的人嘛！相关的证据也不可能全部毁掉吧！总有存留下来的嘛，否则封锁得那么死干什么？所以，用隐瞒手段不能长期起作用，真相总要大白于天下。

子：中央专案组在“两谋”上的认定，没有直接抓林彪，抓的是林立果。

父：林立果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获释后才在中央发的材料里，在社会流行的书刊上看到，林立果和几个心腹发泄过对毛的不满，有的话很露骨。

子：抓住了林立果的那几句话，可以为林彪定罪吗？

父：还是要用事实说话呀，只凭别人揭发的林立果的那些话，就为林彪定罪，恐怕不行吧！那时社会上就有私下议论和诽谤毛主席的事，我从公安的内控报告上知道，是一种社会现象嘛。何况那又不是林彪本人的，林立果的话也是事后从在押人犯嘴里搞出来的口供，还是孤证。那些人嘴上说说，和实际采取军事行动是两回事。

退一步讲，林彪同他的家人是否搞了什么名堂，我不清楚。我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中央专案组抓的“把柄”，那是林立果、周宇驰等人暗中搞的贼路鼠道的名堂。要说是林彪在指示他们搞，或是知道他们搞，从现在公布的材料看，我看没有什么说服力。

子：林立衡说，毛泽东自庐山会议后整林彪，整解放军，林立果不满。他曾和心腹的几人关起门来议论，只是自说自话和乱涂写几句而已，形同儿戏，一出房间就没那回事儿了。何况，他们的这种议论话，对林彪是绝对保密的。

父：犯罪主要是看行动，而不是看你怎么想。

子：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九一三”的研究，只是在间接情节，在涉嫌小事上考虑，甚至拿个别人在事发很久后“交代”出来的“孤证”定案。而没有从大局上，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和错误路线政策的根本原因上去考虑，结果只能是“剪不断，理更乱”。

父：现在人们说的多是“九一三”的表面过程，背后的东西还没有亮出来。

子：可是林彪走了是事实。林彪这一走，事情就复杂化了，被说成是“叛国投敌”。

父：按照汪东兴回忆，毛主席是在林彪“外逃”前十几个小时回到北京的。如果

毛主席要是知道林彪要“外逃”，十个林彪也跑不了啊！

林彪究竟是怎么走的，先不管他。但无论如何，他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走的。林彪要同毛主席面谈，毛不接受，反而在南巡中讲了一路，杀气腾腾。林彪怎么办？找毛主席谈不行，别的办法一时又没有，总得找条活路吧？应当说，林彪是毛主席逼走的，没有毛主席南巡谈话发难，就不会有林彪的出走。

子：有历史学家认为，是毛泽东引起了“九一三事件”，甚至是制造了“九一三事件”，实质上 and 毛泽东整垮彭德怀、刘少奇一样。彭德怀对毛泽东是申辩反驳，刘少奇是和平主义反抗，而林彪是离开避祸。

当然，也有一种议论，任你毛泽东逼，林彪要是不走，就不会那样了。父：那是一个假设。但我认为，毛主席对林彪，不是林彪检讨不检讨，走不走的问题，而是毛主席的思想意识问题，他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批陈整风”会议前，毛主席不只一次说问题已经处理完了。还不到四个月，他反悔了，开始南巡，逼出了“九一三”，这就是毛泽东啊！

我再强调，毛主席对林彪，简单来说是他“要不要林彪”的问题。他要林彪，是一种处理办法，不要了，是另外一种处理办法了，主要矛盾在毛主席方面。

子：迄今中国没有公布“九一三”案情原始材料。甚至规定，相关材料一律绝密，不受《保密法》三十年后解冻的约束，轻易不许外人查阅，如一定要看，须经中央批准……我想，对这些材料一反常规不许披露，肯定它是不支持官方的立场和观点的，否则早就公布了，那样就把林彪“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平息了不绝于耳的非议。

父：指责我们参与政变，也没拿出证据，如果有，那也是一颗“原子弹”，威力大呀！把我们参与政变揭穿了，林彪的罪也就定了，可就是不见他们拿出来。

子：“九一三”后，中央专案组派出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进驻林彪的家，把每一个纸片，每一个线头，都翻过了。对黄、吴、李、邱等人的办公室和家也反复地仔细清查了，居然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政变痕迹。他们对我们家搜查，把棉衣的里子拆开看，皮箱的衬布撕下查；把小妹妹的作业本、我的大学课本、笔记本，都一页一页地编号，查过后盖上“验讫”的专案组公章，真可谓一

针一线一纸一物都不放过。

父：从侦察学来说，这就是没有证据。因为你只要犯了罪，就会留下痕迹，更不用说谋害毛主席这样大的事了。

子：专案组从林彪家找出一些学习卡片，当作政变的证据，说什么林彪“尊孔尊儒”，提倡“克己复礼”。更有甚者，中共中央还转发了个《林彪与孔孟之道》，说林彪是孔孟思想的继承者，让人民把孔子思想当作“反革命”的源头批判。

除了批判林彪的思想外，还对他的历史进行清算，说他反对毛泽东，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井冈山斗争和红军长征途中，以证明林彪的“两谋”是历史的必然。

父：专案审查，过多地在林彪的思想见解和历史问题上搞，是对现实问题缺乏证据的无奈！要说毛泽东一开始就和林彪进行斗争，根本不是那个历史。我很早就亲身感受了毛主席和林彪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

1935年遵义会议后，我调任中央军委四局三科科长，管中央纵队的军务行政和生活保障，就和毛主席在一起了。我们四渡赤水，过大渡河，过雪山草地，经历了长征中最艰苦的一段。我到职后发现，红一军团长林彪经常给毛主席送吃的用的东西和战利品，科里的人对我说，长久以来林彪一直那样作。红军过草地之前，林彪派他的管理员牵上他自己骑的驯良的骡子给毛主席用。毛主席不善骑马，一直没有合意的牲口，那林彪就解决了他的难处嘛！林彪还派了八名身强体壮、政治可靠的战士为毛主席抬担架，他想得多周到！我到红一军团二师把他们领回中央纵队时，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代表林彪送给毛主席二十几斤青稞面的干饼子和十几斤牦牛肉干，那可是珍贵的东西。他们说，林军团长交待，只能给毛主席用。那时毛泽东不是最高领导人，在他之上或差不多的还有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好几个嘛，可是林彪关心的就是毛泽东。后来，中央纵队在草地上遭敌人骑兵袭击，到了陕北铁边城又被敌人冲散遇了险，都是林彪派的那个担架班抬着毛主席跑，才脱险！说的再早些，在江西时毛泽东受王明路线打击，生了大病，心情非常压抑。在毛主席人生最不得意，很少被人理睬的时候，林彪对他一往情深，暗中保护着他。那些是我听说的，而长征中的事，我亲眼所见。现在为了把“军事政变”说得像那么回事，就把毛泽东和林彪亲密的历史关系说成是激烈斗争

的样子，扯谎！

子：有的材料被销毁或灭失了，但中央文档里还存留一些。许多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虽然受纪律和意识形态的约束，有人看过一些原始资料后，对我说，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事是怎么搞出来的，无需你们去辩解，只要把档案公布就真相大白了。在毛泽东和党犯了长达十年的全局性路线错误的历史条件下，让在军队一线主持具体工作三年多的黄、吴、李、邱个人去承担那么多责任，有失公允。

父：既然拿不出证据，那就把你搞“臭”吧！

总后勤部在我们家里搞了个丑化我的“展览会”，影响很大。周恩来闻讯后，派王洪文去看了一下。周恩来听取汇报以后说，在高级干部家里办展览会，过去没有过，是个新创造。对犯错误的人为什么总要“算老账”、“挖祖坟”？添建的房子质量高了一点，那是作为总后战时临时指挥所建的。国务院、军委和各省市都建了这样的房子，大家都在里面住着，拿邱某住的办展览，不是对其他人的挖苦吗？周下令展览立即停下来，说“脑子发热，总是办不好事的。”

子：我仔细梳理了一遍，要说“九一三”直接涉及到你们的“物证”，只有那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信，或许它是对你们实事求是的一个障碍。

父：当时在人民大会堂政治局会上展示那封信，我就对它怀疑，除了字迹以外，也不符合林彪的办事风格嘛。林彪和黄永胜有事，都是面商或是由机要人员转达。林彪从来没给黄永胜写过个人的信，为什么这么关键的事上，莫名其妙地写上了那一封含糊不清的信？

子：那封信和从周宇驰那儿搜查出来的字条，是当作林彪下达政变的“手令”，说什么“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有学者质疑，“盼”和“命令”两个用词很矛盾。既然是“命令”，就必须绝对执行。军事科学院保存着林彪所写的大量命令，从来没有说过“盼”的。何况同样内容的“林彪手令”居然有两个，一个字是横着写的，一个是竖着写的。

父：那你还能说它是真的？！

子：为林彪定性为反革命政变，有一个关键的证据是《五七一工程纪要》，它的名字用了“武装起义”的谐音。

父：之前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1981 年我出来后，看到了，觉得以它为主要证据，蹊跷的地方很多。

子：它是以影印件的形式在全国公布。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部队传达以后，批判林彪的运动就如排山倒海之势。

《五七一工程纪要》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大胆地否定了毛泽东不健康的東西，也否定了当时许多错误政策。它针对文化大革命推行的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政策，如学生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农村劳动、知识分子遭受打击、党内残酷斗争、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等问题进行了鲜明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纪要》里说的这些都在改革开放的头几年里解决了。“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一点，在描述林彪的书中，凡提及、引用、附录《纪要》的，都把它对文化大革命批判的内容删掉了。只是把里面要除掉上海帮“兵谏”毛泽东的设想，当作了反革命政变的证据。

父：在我看来，那不像是久经沙场的林彪所言，反倒是像没有指挥过军队的狂妄书生写的东西。

在政治生活中，在共产党内采用暴力手段，我不同意。毛泽东是我们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人的领袖，他开创了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这面旗帜不能砍倒，尽管他不公正地对待了我和其他许多人，思想中有一些不健康的東西，尽管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人民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子：毛泽东的错误是那个时代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意识造成的，但他本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历史面前，人们可以指点评论。

父：《五七一工程纪要》不是林彪的手迹，也不是林立果、叶群的手迹，栽在林彪头上缺乏法律根据。仅从《纪要》的思想和文字风格上看，我说那绝不是林彪的。林彪的思想是中国式的、传统的，他的语言比较“土”，实在、古板，甚至有些涩口。

子：《纪要》完全是西式的，现代的，词藻华丽、流畅，情绪化的东西很多。

父：熟悉林彪的人看了那个《纪要》，都不会说它是林彪的“杰作”。

子：《纪要》的发现颇为“离奇”。“九一三”后清理林立果在空军学院待过的一个地点，打扫卫生时无意中发现一个丢在那的活页拉练本里写着些东西，二

十多天以后交了上去，就是后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至今没有证据说明林彪知道它。

父：这让人感到荒唐。《纪要》如果是个军事行动计划，应该简明扼要，为什么还写了那么多的政治话、废话、骂人话，说了很多和军事行动不相干的话？

子：这些年来，研究“九一三”的人很多，最近有举证，说林彪乘的飞机已经飞近了苏联边境，然后又调过头来向中国飞回。国内外的一些研究机构公开了那天飞机的航行图，林彪的座机空难时是在由北朝南飞的，向着祖国的方向。

父：我当时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很快就被关了起来。但我可以肯定，苏军的雷达昼夜监视着中苏、中蒙边境地区，会有记录。中苏两国敌对，对于对方的活动，特别是异常活动都有严密的监视。

子：邓小平复出后，1980年11月15日在回答美国记者时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那架飞机驾驶员潘景寅的妻子向中央提出申诉，之后给家属送来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称：“潘景寅同志于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并按潘景寅原来副师级干部级别补发了抚恤金。当时正是公审林彪集团的政治环境，在一片严惩喊杀声中，如果没有对潘景寅有利的证据，不可能对他那样善后。这里有什么内幕，不得而知。

父：说有“两谋”的证言证物纰漏很多，如同当初找刘少奇的把柄一样，更像是人为地在做文章。

当然，以上那些所谓的“证据”对我们从严处理起到很大的作用。毛主席是驾驭全局能力很强的老练政治家，对于重要人物的处理，如果不是极为必要和影响大局，他总是喜欢放一放，挂在那一段时间再说。对于我们几个人，有了那几个“证据”也是不够的，不能马上就下断言涉入“两谋”。为什么毛主席采用了极端手段处理我们，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在关押我的日子里，有不少征候和传言供我判断，1981年公审后我和王洪文同监居住，他讲的情况有助于揭开我心头的一些“谜”。王洪文说的事，发生在他到北京参加中央办公前的，是张春桥、汪东兴、李德生、纪登奎向他讲的，以后的则是王洪文亲身经历和经办的，主要的事情有这么几件：



1971年9月24日凌晨，毛主席批准把我们四个人暂时隔离，有三条指示：“1、不能用处理杨成武的办法处理他们；2、只能说他们在中央开会；3、时间要短，只能几天，此期间不能惊动他们的家属。”后来为什么对我们采取了专政措施，关起来不放了？王洪文说，康生、江青看毛主席有些犹豫，生怕他对你们宽大了，联合汪东兴等人把你们搞成了专政式监护。

毛主席起初很慎重，说：“林彪的问题比党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人物的影响都大，要是处理不好就会倒下一大批人，会伤了党的元气。”他还问了周恩来一句，“林彪坏还是叶群坏？”周答，“从老婆专政这条来说，叶群是最坏的。”毛主席没有反对周恩来的话，默认了。“九一三”后不短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不同意以“集团案”来追究林彪的老部下，说：“按人头来办。只要一搞集团，好多人就会搞进去了。”但是汪东兴提出：“不给他们几个人起个名字，叫起来很麻烦，横竖林彪人已经死了，取个名字比较好。”毛主席随口说：“可以叫林彪死党”。由此，“死党”这个俗语就成了我们一大批干部的“专用词”了。

子：“林彪死党”和文革初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样，毫无法律依据和界定标准，只会造成“扩大化”。

父：王洪文还说：毛主席对你们几个，总认为缺乏证据。专案组搞上来那么多材料，他都认为不足为据，不能令人信服。他基本上采取“拖下去”的方针，想拖上一段时间再看看。毛主席告诫政治局的同志，“要冷静观察，犯点官僚主义有好处。”他的意思是，对你们几个不要急于处理，就在那“挂着”放一放、冷一冷再说。但是政治局里多数人不愿意毛主席那么作。我们（四人帮）认为你们垮了没用了，积极要处理你们的是叶剑英、汪东兴、李德生。

子：恐怕他们各有各的目的。

父：叶剑英他们主要是从军队工作出发，不把我们搬开，别人就只好放手开展工作。汪东兴是从自己的利害关系出发的，不“封口”不放心。

王洪文说：在中央内部，毛主席比较冷静，周恩来很谨慎，但是其他人在严惩你们上是一致的。审查1972年夏天之前基本结束，周恩来提过三个方案：1、处理吴法宪一个人；2、处理黄、吴两人，李、邱不作组织处理；3、把四个人继续放一放再说。毛主席倾向于只处理一个人。

子：若从为首的来说，要处理黄永胜。

父：王洪文说，在关键的时刻周恩来说了话：“黄永胜没有民愤，吴法宪民愤大。”

毛主席同意周的意见，想只处理吴法宪一个，风趣地说：“这是个以少换多的办法，很划算！”但是康生、江青他们，以及叶剑英、汪东兴都不同意这么办，事情就拖了下来，维持着把你们关在卫戍区的原状。

子：周恩来对你们与人为善，以至于毛泽东有了感觉，曾说他“对刘（少奇）的人太左，对林（彪）的人太右”。这个，我只是听说，还没证实。“九一三”以后周恩来日子非常难过，毛泽东有几次整人是对着他的。

1972年“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又像延安整风时那样向毛泽东亮出他的“底牌”，以自我诋毁的语言，用数个晚上向与会者讲自己的历史错误和罪过，沉痛地检讨，几乎是痛哭流涕。

父：周恩来不会只是单纯的检讨，他会有内涵的。

子：周恩来借此机会向大家说明了“伍豪自首”问题，防止有人在这上对他出手。从那以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就比较公开了，他对外交部一个文件批示，批评周“大事不请示，小事天天报……”1974年江青到天津地区活动，在小靳庄要一名姓周的女社员改名“周克周”，说用我们这个周，克他（周恩来）那个“周”。更有甚者，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借评论《水浒传》说：“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全国开始了批宋江的运动，影射周恩来是“投降派”。周恩来在1975年9月20日进手术室之前，又一次在反驳“伍豪自首”的材料上签字，防止日后别人借此“做文章”，并悲愤地大声叫：“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父：周恩来有软弱的一面，他悲戚呀。

子：周恩来是中央专案负责人，对明显错案的李雪峰、郑维山，都不敢为他们说话，更不用说对你们了。

父：周恩来把我们的事拖着，是好心，却给了让人整死我们的机会。1973年党的“十大”要召开、要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不处理我们是不可能了。

我听王洪文说，“十大”前，处理我们的事又提到日程上来，康生等人向中央提出了严惩我们的建议，但是毛主席仍然不同意对黄、吴、李、邱、李雪峰立即处理，说还是再放一个时期比较好。

子：可以看到的与此相关的资料很少，但可以查到，1973年5月25日，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关于批林整风，他强调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以“九一三”为线，犯了错误允许改过，暂时未认识到错误的可以等待。

父：王洪文说他是“十大”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副主任），他按着毛主席的这个意思，在拖。“十大”前，康生等人发动上海等省市提意见，要求处理黄、吴、李、邱、李雪峰，并向毛主席写了个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上没什么定论的批示。按当时的办事原则，对这样重大的问题要毛主席明确写上结论性的断语才行。

子：我对能查到的文献资料进行检索，查了所有能找到的，有的还是权威性的。但是，凡是记载到了这儿，就闪烁其词，回避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决策都有毛泽东的批示，唯独这件事，却看不到他批写的文字。这样的大事“稀里糊涂”，一般不可能。

父：对高级干部处理，有开中央全会进行决议的制度。因为政治局委员是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对其处理，应当由中央全会来办。

子：建国以来，对高岗的处理是七届五中全会，对彭德怀是八届八中全会，对刘少奇是八届十二中全会，文化大革命后对“四人帮”的处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唯独对林案，处理政治局委员人数最多的这一次（一名副主席、两位政治局常委，八名政治局成员）却没有开中央全会，这个必须履行的组织手续，一反常规没有作。

父：王洪文说，对我们的最后处理“决定”，不仅中央全会没有开，毛主席本人也不知道。“十大”以后，毛主席提出了对原来任过政治局委员的，凡没有定下是“反革命”的一律养起来，中央组织部门提出了每月发二百元钱生活费的大概方案。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议及到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黄、吴、李、邱几个人没做结论，这样安置比较好。”因为没人敢露出真情，会场上的人很紧张，冷场了很久，汪东兴硬着头皮向毛主席说：“对黄、吴、李、邱、李雪峰在‘十大’前已作了结论，开除党籍了……”毛主席听了很惊讶，足有几分钟瞪着眼睛没有说一句话，大家吓得不敢吭气。最后毛主席很生气地说出了一句很重的话：“林彪的雷厉风行容易出乱子、出毛病！官僚主义并不见得都坏，官僚主义有两重性！”

子：毛泽东是指：对你们的处理，官僚主义式地拖下去有好处！

父：是呀！那天在场的人怕毛主席要发脾气、大发雷霆，大家都紧张得很，害怕了，因此王洪文记得特别清楚。

子：1973年7月，中央专案组提出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审查报告》，建议中央：1、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2、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动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3、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4、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个文件，由中共中央于1973年8月20日做出的决议，只有一句话：“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的报告。”这里的说的“中央中央”是中央政治局新工作班子，有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王洪文、华国锋、吴德等十一人，其中纪、李、汪是候补委员，而王洪文等三人连政治局成员都还不是，有效票不到政治局正式额定人数21人的一半。五名政治局委员组成的工作机构开除包括党的唯一的副主席和其他八名政治局委员，可以吗？

父：对刘少奇定性处理，是周恩来组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办的，他们完全清楚法定程序该如何做。

子：而这一次却没开中央全会，合理的解释就是要绕过毛泽东。于8月24日至28日举行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公报上，只明确了开除了林彪、陈伯达两人，对其他的人，含混地说同意对林彪反党集团其他主要成员的处理。公开的地方看不到开除你们的字句，让人感到好像在用“障眼法”。

按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的东西，以后只有在同样的大会上才能否定，但是九年后1982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撤消李雪峰定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恢复李雪峰的党籍。”轻易地否定了以前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议。

父：开除我们的组织手续疑问很多，必须要当事人回忆或到档案中核查才能了解真实情况。

子：而中央现在对此封死不露，好像忌讳什么。

父：就算是开除了党籍也没有说我们是反革命，毛主席还是要把我们养起来，每月二百元钱生活费算是饭钱，住房、看病、水电杂费公家要包下来，不用自己花钱，这相当于省级高级干部的待遇。1973年10月，卫戍区里的看守人员忙碌起来为我打点行装，说是中央安置我到南方某城市居住，说好像是湖南岳阳。卫戍区看房子的人都回来了，说很快就走。可是过了很久又没有行动，耽搁了下来。看管人员对我说，公安部长李震不明不白地死在公安部办公大楼地下室里了。汪东兴提出了他的死可能与黄、吴、李、邱有关，要等李震的案子搞清楚再说，事情就拖了下来。

子：李震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李震是中国公安部长，国家专政机器的头。谁能够置他于死地，不是很明白吗？一个是他的上头（中央），一个就是他自己（自杀）。无论哪种死法，李震都是林彪案“扩大化”的牺牲品。

父：1973年的国庆期间，警三师师长问我：“你为什么没有过去那么胖，面色也不好。是否营养不够？”看管组的人代我回答：“他的饭量不大，吃的东西也不够丰富多样。”师长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样出去……”他要说的话大概是“这样出去了不好看”，说到一半就停口了。师长向看管组交待：“你们明天派个人跟我到师农场去。”

第二天他们抓回来一笼子活鸡。晚饭打来了一碗鸡汤和适量的鸡肉，说：“多吃一点，长胖一点。”那天我没在意，以后每天都有一碗鸡汤，我就奇怪了，问看守人员，他们说：“我们师长在为你改善伙食。要把你的身体搞好。师长最近到中央去开过会，布置你们出去的问题。周总理有指示，要注意你们的生活，人不要搞得样子很难看。”喝鸡汤原来是要放我们出去安置的准备工作之一。

1974年元旦刚过，安置我去外地的事又忙了起来。春节前五天，看守组去外地接洽的人赶回来了，通知我做马上启程的准备。师里宣布我的看管组全体人员阴历二十九可以回去，放假一个月回家过年，他们这几年从没有离开过我。我一走，他们就“解放”了，一个个喜气洋洋，忙着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但是，对我的安置突然停了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要把我们放出去“养起来”。但是上海帮和汪东

兴等人抵触，说：“不能暗着走，要明着走”。不久，“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周恩来自顾不暇，没落实。据说，那一次安排出去“养起来”的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我、李雪峰、陆定一等人。

子：你所说的逐步把对你们的惩治升级的情况可靠吗？

父：我没有准确的材料，细微之处难说，但大的轮廓是可信的。对以上说的那些事，我考虑基本是真实的，依据主要有二个：

第一、王洪文后来和我在狱中同住在一起几个月，我详细地问了他。王洪文“九一三”以后到北京参加了政治局办公，“十大”当了中央副主席、主持过中央日常工作，许多事情是他办的或知道的。

第二，我的感觉和政治判断。我们的行为，是高级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台上执政时带有普遍性的典型。我们不理解文化大革命，讨厌上海帮，就是那么多事情，拿起来千斤重，放下去半两轻。毛主席对此非常清楚，他生前并没有对我们几个把事情做绝，留有很大余地。

在中国高层政治舞台上，让哪些人在台上，让哪些人下台，让哪些人“坐冷板凳”靠边站，是毛主席的谋略和指掌之中的事。我们毕竟很早就追随毛泽东，是他从江西中央苏区带出来的一手提拔重用的人。哪一天毛主席想到这，或者他再要打别的什么集团要利用我们搞平衡，说不定会放了我们（当然不是像原来那样的重用）。毛主席用人之道很奇特，不太讲究名分。毛泽东最痛恨的人首先要数王明，周恩来曾在王明那边，毛却放手大胆地用周。邓小平很早就是毛泽东自己的人，却两次被毛打倒了。但邓小平耐心地等待，遭受磨难，终于等到了出头的一天。我们也在等待着，等着可能会有些宽松，等着有个较好的安置，哪怕是落实毛主席说的“养起来”也好，但是毛主席病重了，无暇顾及了。

---

## 【文摘】

### 军宣队指导员张国臣

徐 罗

1966 年以后十年的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所谓“文化大革命”早已超

出“文化”的范围。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老师与老师，下级与上级，干部与群众……人与人之间相互揭发、批判、斗争，虽然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究竟什么是革命？要革谁的命？但人人都不得不卷入这一场残酷的斗争之中。

1968年，军宣队进驻学校，每一年级，都派来一位指导员，我们年级的指导员是张国臣。

张指导员来自河北农村，二十几岁，浓眉大眼，身材高大。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位帅哥。伟大领袖曾把“工宣队”派进学校改造知识分子，把大家改造得胆战心惊，不知这批军人又将如何教育改造我们？我早被划入出身不好的一类被改造对象，每日生活在忧郁与恐惧之中，处处小心行事，对张指导员敬而远之。

那时，伟大领袖不断发表“最高指示”，有时在白天，有时在半夜。夜里，老师们几乎都和衣而眠，留心听着外面的动静。只要锣鼓声一阵紧一阵地响起，高音喇叭刺耳地喊着：集合啦！集合啦！传达最高指示啦！我们就马上跳起来，急奔出去，老师和住在学校的学生们慌慌张张地集聚在操场上，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声背诵过去发表的“最高指示”，等待新的“最高指示”的降临。然后，大队人马绕着学校附近的街道，高喊口号，游行至半夜，有时至天亮才能回校。我的儿子只有三岁，白天放在张大娘家，晚上，我俩相依为命。若是晚上发表了“最高指示”，我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把儿子反锁在房中，喊着口号在街上游行的过程中，我的心时刻都在受着煎熬，不知孩子是否掉到床下了？是否受到惊吓了？是否闯了大祸？是否在哭……内心的苦，是还没有做妈妈的人们难以体会的。后来，女儿又怀在肚中，一个孕妇，要和十三四岁的学生们一起去游行，一会儿要跑步追赶前面的队伍，一会儿要去照顾掉队的小同学，这是多么艰苦、多么危险的事。我不能提出不去游行的要求，因为，只有受审查的人，才没有资格去游行。

有一天，张指导员来到我们办公室，当着老师们的面对我说：“罗老师，以后你不要和学生们一起去游行了。很抱歉，我不知道你怀孕了，保护身体吧。我会带你们班级学生去游行的。”那时，学校到处都是大字报，到处是揭发、批判、斗争，在不时传来口号声、皮鞭声的“革命”洪流中，处于逆境的我，听到这样关心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如今，四十几年过去了，我仍然没有忘记那充满人性的、充满温暖的、亲切的话语。

不久，到农村去“学农”劳动又开始了。我是班主任，要带领五十几个学生到北京远郊的一村庄去劳动。有一位老师对革委会领导说，罗老师有四、五个月身孕了，还要去吗？领导说，难道农村妇女怀孕了就不劳动了吗？知识分子要向农民学习！

我无话可说。

革委会要求大家向解放军学习，一切按军队编制，班级叫做几连几排，每个师生，将所盖的被子，换洗衣物，洗漱用具通通打成背包，背在身上。乘车到达北京郊县后，要在一条崎岖的小山路上行军近两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城市的学生们，从来没有走过这样崎岖蜿蜒的山路，年纪又小，背着沉重的大背包，半小时后，有的同学就走不动了，有的体弱的同学一边擦泪一边一瘸一拐地走。我自己背着背包，既要鼓励大家坚持行军，还要照顾掉队的学生。我不断告诫自己，坚持下去，决不能倒下！

到达目的地后，同学们分散住在农民家的土炕上。每天，发给每户玉米粉和面粉，学生们必须自己借用农民的锅灶，做出一天所需的馒头或玉米饼子，解决一日三餐。清晨，天微微亮，村庄还笼罩在薄雾中，一片寂静。我必须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崎岖的小路上，挨家挨户去叫醒熟睡中的小同学们。还没走到第一家，护家的大狗，就狂叫着向我奔来，吓得我立即蹲在地上，抓起一根树枝，乱舞起来。每走到一家，身后就多一条狗，走到最后一家，身后跟着一群大大小小不同颜色的狂吠着的狗，整个村庄在一片狗叫声中苏醒。

中午，张指导员来了，他说每周他将在我们班级呆两天，帮助处理事务，带领同学劳动。他向学生们宣布：罗老师负责处理同学们生活等后勤工作，但不能挑水。田间劳动由另一位教师负责。每天早上由一名班长和老师一起叫同学们起床。我心里明白，面对还不太懂事的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张指导员是在尽力保护一个母亲。如今，我的儿女都已长大成人，他们感恩那位未见过面的张指导员的保护，否则，他们也可能没有现在这样美好的人生。

张指导员和学生们一起开会、军训。经常看到学生们欢快地围在他的周围，跟在他的身后。从未见到他像很多班级的指导员那样，收集教工的“材料”，挑动学生斗老师，以搞到多少“黑材料”，开了多少次批斗会为自己的“革命”工作成果。



不久，掀起了各班学生揭发老师封、资、修思想的高潮，逼迫老师们一次又一次地作检查。有的老师被打了，有的老师自杀了，等待我的是什么呢？一天晚上已十点多钟了，我的房门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我想，大概轮到批斗我了，打开门一看，门外站着的是我班的几位学生干部。班长说，老师，明天你要在班级里做斗私批修的思想检查，这是一份人民日报，你今晚好好看看社论，抄一部分在你的检查里，明天我们就说你检查深刻，可以通过了。我不解地看着他们，你们在帮我过关？他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和指导员一起，问过很多你曾经教过的学生和一些家长，他们说你是一位好老师，你多次帮助过父母都被隔离审查、身处困境的同学，还尽力在班上开展各种活动，把五十几名学生团结在校内，不让他们在校外惹祸，家长都很感谢你。

我想起了一个小女孩，她有一张聪慧的可爱的笑脸，文革开始没有多久，她的父亲不堪受辱自杀了，不久母亲也被隔离审查，勒令到五七干校去劳动。妈妈只能把最小的孩子带走，偌大的一个家，留下只有十二三岁的她，白天还好，可在学校，晚上害怕不敢睡觉，只能偷偷地想妈妈，不停地哭泣。看到她红肿的眼睛，我知道了这一切，我是一个母亲，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如果她是我的孩子，我能不管她吗？于是，我问她，老师的家里还有一个小弟弟，你愿意和我住一起吗？从此，她就住在我的宿舍里，我将教工食堂的饭票给她，可以正常解决一日三餐。晚上，当我看到她和我三岁的儿子欢快地唱歌、玩耍时，我也高兴得笑了。有同事好心地对我说，她的家里有问题，你不怕受连累吗？怕当然怕，可是，母亲的心让我不能不管她。

几个月过去了，听说部队要换防，学生们都暗暗着急，张指导员会调走吗？后来，一部分解放军留下来，继续在校工作，抓阶级斗争有功的，自然升职了，还有一部分调走了，我们再也没有见到张国臣指导员。又过了一段时间，学生们在传说，张指导员可能因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已让他复员回家。

有一天，课间操后，我在办公室休息，突然几个学生跑来，很激动地说：老师，我们接到张指导员的电话啦！电话还没有挂，你快去，指导员要与你说几句话，你快点呀！在通话中，我才知道，他是从河北老家的镇上打来的电话。我问他，真的让你回家种地了吗？他说，可能在镇上找个工作。他还说，你们班上的同学都很不错，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的人才。但是，现在外面很乱，到处出现武

斗，有些学生的家长受审查，有的被隔离，无法照顾这些孩子，请你尽力多关心照顾他们。我做过很多的调查，知道同学们信任你。匆忙中，我也忘记问他的联系地址。

从此以后，几十年来，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我的内心一直存在内疚，张国臣指导员是否是因为保护、照顾像我这样的一批被改造的人，而被视为阶级斗争观念不强，被复员回家了呢？

前几年，我有机会到北京去，见到了几十年都未见到的原来班级的部分同学。他们也都人到中年啦，如张国臣所料，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还有几位同学，担任了国家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大家欢聚在一起，激动地回忆起小时候的各种情况和友谊，也回忆起张指导员。虽然他与大家相处只有几个月，但他的正直、善良与纯朴永远留在大家的心中。在那个时代，正是有一批像张指导员这样善良、正直的普通人，让无数受到压制、迫害的人们，看到了希望，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我们又有了安定、平静的生活。张国臣指导员，不知你现在何处？几十年来你的生活可好？愿好人一生平安！

2007 年 8 月初稿

2010 年 6 月 修改于美国达拉斯

原载“老来乐”网站。

---

### 【小资料】

##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名单

( 1968 年 2 月 3 日成立 )

主任——

李雪峰，61 岁，山西永济人，原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  
地主出身

## 副主任——

刘子厚，57岁，河北任县人，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中农出身

马 辉，53岁，江西永新人，河北省军区司令员，贫农出身

曾 美，54岁，江西兴国人，河北省军区政委，贫农出身

张英辉，55岁，江西兴国人，六十三军军长，贫农出身

刘殿臣，30岁，河北兴隆人，石家庄国棉一厂工人，石家庄工代会负责人，贫农出身，转业军人，共青团员

耿长锁，66岁，河北饶阳人，饶阳县五公公社社长，劳动模范，中共党员

## 常委——

袁 捷，48岁，湖北英山人，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中农出身

陈仁洪，51岁，江西铅山人，二十四军军长，贫农出身

李光军，49岁，江苏睢宁人，三十八军军长，中农出身

徐 信，47岁，河北灵寿人，六十三军副军长，贫农出身

刘克宽，51岁，河北满城人，六十五军副政委，地主出身

王金山，52岁，河北束鹿人，原中共张家口地委书记，富农出身

杨磊之，49岁，河北完县人，原河北省副省长，地主出身

刘 英，45岁，河北献县人，原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中农出身

王常伯，49岁，河北大城人，原中共承德地委书记，贫农出身

赵书茂，27岁，河北衡水人，石家庄井陉煤矿工人，中农出身，中共党员

刘喜来，33岁，河北正定人，石家庄铁路分局工人，工人出身，中共党员

刘相友，28岁，河北南宫人，邯郸国棉三厂工人，贫农出身

朱秀欣，28岁，河北徐水人，保定化纤厂工人，下中农出身，共青团员

吴中法，35岁，江苏常州人，河北省出版社工人，中农出身，中共党员

王国藩，49岁，河北遵化人，遵化县建明公社社长，贫农出身，中共党员，劳动模范

史春华，女，21岁，河北藁城人，藁城县岗上大队民兵连长，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李全寿，52岁，河北平山人，平山县南滚龙沟大队党支部书记

于长太，21岁，吉林东风人，石家庄机械工业学校学生，革命干部出身，共青团员

徐维京，女，21岁，河北无极人，党群学员（原文如此），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刘学兰，女，22岁，河北雄县人，保定市革命红楼公社文工团团员，下中农出身，共青团员

高恩泽，32岁，河北任邱人，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中农出身，中共党员

赵登元，28岁，河北景县人，河北省公安厅干部，下中农出身，中共党员

（31名，暂缺2名）

#### 委员（除上述常委外）——

谢 辉，59岁，山东莒南人，原河北省副省长，中农出身

李振智，56岁，天津人，河北省军区后勤部部长，城市贫民出身，旧军人成份

卢 克，56岁，福建永定人，河北省军区原副政委，工人出身

朱 凡，47岁，陕西延长人，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贫农出身

赵大满，58岁，河北深县人，北京军区炮兵副司令员，贫农出身

郭恩志，42岁，河北任邱人，六十三军副团长，贫农出身

徐恒录，47岁，山东莒县人，三十八军副团长，贫农出身

黄显才，35岁，辽宁辽中人，承德市武装部参谋，贫农出身

戎冠秀，女，70岁，河北平山人，平山下盘松大队支委，贫农出身

吕玉兰，女，26岁，河北临西人，临西县下堡寺公社书记，中农出身

杨学辉，31岁，河北大厂人，大厂县南寺头村贫协主任，贫农出身

傅英杰，44岁，河北定县人，石家庄军分区代政委，贫农出身

陈永义，58岁，河北易县人，石家庄专署副专员，贫农出身

郭 志，42岁，河北藁城人，衡水地委代书记，富农出身

吴 武，27岁，河北衡水人，衡水专署石油公司工人，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王山子，47岁，河北获鹿人，衡水专署建筑公司工人，中农出身，中共党员

王玉坤，53岁，河北安平人，安平南王庄大队队长，贫农出身

曲振江，22岁，河北献县人，衡水中学学生，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李植林，57岁，湖北红安人，张家口军分区政委，贫农出身

陈万山，37岁，河北大厂人，张家口采矿机械厂工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秦德贵，30岁，河北宣化人，庞家堡铁矿工人，贫农出身

刘太，36岁，山西浑源人，张北县十五号大队支书，贫农出身

张玉兰，女，23岁，河北涿鹿人，涿鹿县城镇公社西关大队副支书，贫农出身

余向荣，女，23岁，河北邢台人，张家口师专学生，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张贵，29岁，河北宣化人，地委宣传部干事，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张洪武，49岁，河北丰润人，天津军分区司令员，中农出身

邢安民，44岁，河北束鹿人，天津地委副书记，贫农出身

于宝和，35岁，天津人，天津运输公司司机，贫农出身

杜江，34岁，天津人，天津地委办公室办事员，中农出身，中共党员

邢燕子，女，27岁，河北宝坻人，宝坻县司庄子大队副支书，下中农出身

陈广跃，20岁，河北静海人，静海中学学生，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张志，43岁，河北玉田人，邢台军分区副政委，贫农出身

冯世英，54岁，河北邢台人，邢台专署专员，新中农出身

刘志勇，31岁，河北藁县人，邢台冶金厂工人，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冯文瑞，20岁，河北定晋人，邢台师范学校学生，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王集家，31岁，河北清河人，邢台地委宣传部干事，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刘京彩，女，20岁，河北柏乡人，柏乡县南瀑大队支书，中农出身

汤士珍，24岁，河北乐亭人，河北医学院学生，中农出身，共青团员

于东海，28岁，石家庄人，华北制药厂工人，工人出身，共青团员

张青勉，女，17岁，河北晋县人，晋县东卓宿大队农民，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芦凤雁，42岁，河北正定人，动力厂工人，工人出身，中共党员

朱智勇，50岁，河北安新人，沧州军分区司令员，贫农出身

周振华，57岁，河北阜平人，原河北省委候补委员，贫农出身

曾庭友，38岁，河北蔚县人，沧州市运输公司工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申广昌，38岁，河北交河人，交河县梁屯村大队社员，下中农出身，中共党员

张书元，25岁，河北沧州人，沧州市大和庄大队社员，中农出身，中共党员

张学义，20岁，河北吴桥人，沧州卫东师范学校学生，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卢彦山，50岁，湖北大雾人，唐山军分区司令员，贫农出身  
李维新，42岁，河北丰润人，唐山地委副书记，中农出身  
许家信，48岁，安徽寿县人，唐山市委代书记，工人出身  
胡志忠，35岁，河北秦皇岛人，秦皇岛造船厂工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樊德玲，34岁，河北丰润人，唐山红旗四矿工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刘金良，28岁，河北唐山人，唐山第五瓷厂工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王世惠，31岁，河北乐亭人，乐亭县赵滩大队支书，贫农出身  
柏玉兰，女，24岁，河北玉田人，玉田县厂白沃大队团支书，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刘文仲，20岁，河北深县人，唐山市二中学生，中农出身，共青团员  
刘雅化，35岁，河北唐山人，河北省二建公司工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李文祥，47岁，河北平山人，衡水军分区政委，中农出身

说明：进入革命委员会的军队代表和干部代表均为中共党员，不另注明。群众代表中分别属于哪一派群众组织不详。望知情者提供。

---

### 【编读往来】

#### 1、周七月谈王任重与红卫兵

王任重在文革初期的作用比较大，特别是红卫兵的兴起。我那时（轰工作组后）听说三论《红卫兵造反精神万岁》是在他的幕后主持下写并定稿的。最近，我问了卜大华，他说王任重确实参与了。但没有传的作用那么大。

#### 2、李逊谈“砸联司”武斗与死亡人数

看了2011年第1期《记忆》上顾训中《关于上海文革的几个问题——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作者商榷》一文，一些见解很有新意，深受启发。但有一处提到我的地方，想说明一下。即麦书中所说上海“砸联司”武斗导致了18人死亡，

并说明“这个数字引自裴宜理、李逊《无产阶级的力量》。”这可能又是一个翻译错误。因为我的数据引自《上海文革史话》，原文是：“自‘上柴联司’事件以来，全厂有 983 人被打伤，663 人被关押，其中 11 人被关押 8 年之久，1 人关了 6 年；121 人被打伤致残，死亡 18 人……”所以，这里的 18 个死亡人数是指自从武斗以来，而不是指武斗当场死亡人数。事实上，在引这段资料之前，我已经说明武斗当场没有打死人（不过后来我在一个资料上看到说死了一个人）。我估计，此事可能不怪《最后的革命》作者，而是裴宜理的英文不尽准确，她用的是“In the Shanghai Diesel Engine Lisna Si incident”，我当时也没有看出来，所以如果这是个翻译上的错误，那我也有责任。

### 3、[庄菁瑞谈读 67 期感想](#)

67 期关于张鲁的内容让我很感慨，从他这个人的一生想到他那个时代，再想到他没有完成的那些人生目标……很多情感不是用文字能够表达得清楚的。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看到的那些习惯上被称为历史的东西，都是些粗线条下的帝王、圣人履历，很少有平民角度的、把普通人当成主体的记载。我喜欢张鲁的文章，是他用生动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画面，那些曾经鲜活的一张张稚气的面容，不应该被遗忘，这才是我们民族历史最真实的一部分。

林达文章中谈到的问题，是我们大部分国人从未想过，也不愿意去思考的问题。之所以会有如此的群体产生，至今无人关注，不远的将来便会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是因为在我们民族的意识中，从来漠视个人的存在，只有集体没有个人的观念几千年来都是主流。这样不尊重生命个体的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历史上都是常态，见而不怪了。谈到反思，谈到反省，大家的注意力都习惯地放在宏观大方向上，很少有人从问题的深处找原因。我们和德意志民族相比，

无论是社会制度，还是民族文化，都相距甚远，要我们民族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像德国人那样全民反思，是不可能的。除了现实的社会制度不允许外，我们的民众也没有德国人那样的“觉悟”。前几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提法，觉得很不错。博主不用人权这类词语，而是用了最浅显易懂的四个字“把人当人”来说明问题。这个说法很适合我们的国情。我们的历史上、现实中，有太多太多的拿人不当人的事发生。21 世纪的今天，我们的公民教育就应该从“把人当人”开始。没有这样的“基础教育”，任何反思，都不会是深刻的和深层次的，要想避免“犹太群体”这样的民族悲剧，更是妄谈。

#### 4、马小星谈读张鲁文章感想

《记忆》67 期“文摘”栏两篇旧文都极好，《中国犹太人群体》一文数月前已读过，但张鲁的《红卫兵武斗忏悔录》却是第一次读到。也许是中国实在太大了，也许是我以前的关注点不在这里，我对张鲁其人竟然毫无所知。读了《悼张鲁》，我才知道这个人的坎坷经历和这篇奇文的产生经过。《忏悔录》我读得很仔细，结尾那几段散文诗一般的文字，令人咏叹再三，我还在办公室朗诵给年轻人听。我把《忏悔录》和《悼张鲁》一并推荐给朋友们阅读：请记住这个人，记住这篇血染的回忆录。这篇文章有多种用途，不仅仅是研究文革史，即使探究人的本性演变与文明的关系（我或许更注重这一方面），都极有价值。因为在那种极端的氛围中，潜藏于人心灵深处的一些东西会毫无遮掩地暴露出来。我完全赞同《悼张鲁》文中的看法，有关张鲁的官方宣传以及他的得奖作品，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被消解、被湮灭，但他的《忏悔录》将长留世间，“仅此一篇即可无憾”！后人编纂《二十世纪中国实录》这类丛书时，不应该也不会放弃这篇好文章的。



## 5、编者启事：

本刊自创办时起就明确了是“不定期”的刊物，但一段时间以来，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半月出一期的现状。在听取各方意见后，为了提高质量，我们决定放慢出刊速度，改为每月只出一期。以后各期将于每月的最后一天发出。凡在这一天未收到《记忆》的读者，请知达。